

省港大罷工簡史

1925-1926

一百周年紀念版

鄧中夏



目錄

再版說明.....	2
代序： 震動世界的三罷及其領袖、記錄者 兼烈士鄧中夏.....區龍宇.....	3
第一章 1922年香港海員大罷工.....	17
第二章 1925-26年省港大罷工.....	37

再版說明

省港大罷工百周年，我們本該再版鄧中夏《中國職工運動史》全書。遺憾的是我們受到很多不利條件的限制，拖延至今，唯有先挑其中有關香港兩章再版。其次，此書已經難以在坊間找到，比較易找的只有網上的繁簡兩版，但往往錯漏。現在編者根據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本加以核對改正，若讀者仍然發現錯誤，歡迎來信糾謬。由於文字都是一百年前了，有些難解的詞匯，就加上注釋，而鄧中夏所作注釋，則稱為「原注」。

省港大罷工簡史 / 鄧中夏

A Short History of the Canton-Hong Kong Strike

by Deng Zhongxia

出版：一丁工作坊

日期：2026年9月20日

電郵：hkstudygroup2022@gmail.com

電子書：港幣40元 / 4英鎊

實體書：港幣80元 / 8英鎊

代序：

震動世界的三罷及其領袖、記錄者

兼烈士鄧中夏¹

區龍宇

經過了一九抗爭，中共取消香港自治權，香港人經歷了淪陷或者大流散。這種「家園被毀」的時刻，往往誘導受害者回望歷史。其中一個值得回望的，就是省港大罷工。剛巧，2025-26年，是省港大罷工100周年紀念 — 之所以橫跨兩年，因為它罷了16個月的工，要到今年十月才算100周年完結。所謂省，是指廣東省/廣州。那時候，很多香港打工人，來自廣州及周邊地區。25萬人發起總罷工後，香港癱瘓了。工人也連群結隊回廣州。幾代香港人都熟悉的「三罷」²「行路上廣州」³、等名詞，都與省港大罷工很有淵源。

官方沉默應對

省港大罷工發生於1925年6月至1926年10月之間，時長之久曾經世界居首。這次大罷工發生期間，正是國民黨和共產黨合作時期，也受其領導。沒有這次罷工，國民黨在廣州的政府就很難立足，共產黨及剛成立的總工會也很難那麼快擴大其工運基礎 — 他們當時在香港只有幾十個黨員。之所以能夠成事，根本原因在於，一場社會大革命早已在全世界，在中國，悄然踏上歷史舞台。

然而，在2025-26年的今天，國民黨沒有，連共產黨也沒有，連它的全國總工會也沒有紀念省港大罷工（總工會成立與大罷工同年，且直接相關）。今日國民黨無論矣。2025年4月28日，中央慶祝全總成立，習近平致辭，省港大罷工紀念卻隻字不提。⁴更稀奇的是，去年6月22日，余衡方在明報報道⁵，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在該年1月原擬在6月紀念省港大罷工暨中華全國總工會成立100周年，還徵集論文。最後全部無疾而終。作者問：「這場『沉重打擊英帝國主義在香港的統治』的『壯舉』，內地竟然沒有大張旗鼓的紀念活動嗎？」

更為諷刺的是，1926年也恰好是英國總工會舉行第一次總罷工。英國國體與中國不同，很難想象政府會去紀念什麼總罷工。但這一年，英國工會界、社運界、學界都有大大小小許多紀念和研討會。大陸呢，從政府到民間都對自己有相當影響的大罷工鴉雀無聲。

香港工聯會的愛國論

只有香港工聯會比較認真紀念。但它要紀念的，又是什麼？工聯會去年6月21日舉行「弘揚愛國主義精神」的紀念大會，出席者包括香港官員、大陸及香港的工會代表等共500人。⁶會長吳秋北強調「在國家蒙辱的...關頭，上海『五卅慘案』的槍聲，激起了全

國人民的反帝怒潮。...省港大罷工不僅是一場的工人運動，更是一場偉大的反帝愛國鬥爭」。在這篇不長的報道裏，「愛國」兩字共出現了25次。

這次紀念前九年，香港社會保障學會連同一些學者及工會界，已經開過一次「省港大罷工九十周年研討會」，兩年後還出版了論文集。工聯會文膽周奕既在會上做了報告，後來也寫了兩篇文章，重點也放在「省港大罷工是愛國運動」上面。⁷其實呢，歷史真相是，大罷工既是反帝愛國運動，也是民主運動。兩者不可偏廢。因為罷工委員會提出的六大訴求中，就有四項民主與自由要求——要求普選、各種政治自由（包括罷工自由）、無論華人西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參看余衡方上文）。到今天，香港人還是沒有普選權呢。大家就知道這次大罷工的歷史意義多麼大——香港的群眾性民主運動，要再等到21世紀才重拾普選要求呢。

周奕還說，省港大罷工「是一場沒有經濟訴求的反帝反殖的政治性大罷工。」⁸那就有點笑話了。余文就列出了其餘兩項經濟要求：

- 1 制定勞動法、八小時工作制、最低工資制、廢除包工制、強制實施勞動保險等；
- 2 取消原有租屋條例，減租二成；⁹

大罷工不只愛國，還要民主

大陸對省港大罷工隻字不提，為什麼呢？你懂的。香港工聯會雖有紀念，其會長卻把「民主自由」和「分配正義」開除出「運動意義」，只剩下「愛國」兩字。為什麼要閹割省港大罷工的民主和分配正義的靈魂呢？是不是不想惹火上身？試想，如果會長如實報告，不服氣者出來質問：「我們到今天，不要說八小時工作制，連工時上限也沒有，更加沒有普選權！一百年過去了，你中國政府收回香港都快卅年了，這些起碼政治和經濟權利都不見蹤影！還債呀唔該！」會長如何回答？

這也是為什麼，中共的史官和宣傳，都把近代人民反抗，只解釋為愛國運動 — 五四運動是愛國運動，省港大罷工也是愛國運動。工聯會在愛了25次之後，「愛國」早就置換為愛黨了。且看香港地方志中心副總編輯劉蜀永教授怎樣「理論聯繫實際」吧！他說：「西方國家仍在打壓中國，因此紀念這場大罷工具有現實意義。」¹⁰「我們要弘揚前輩不畏強權、敢於鬥爭的愛國精神，讓香港更繁榮、讓祖國更強大。」¹¹經過2019-20至今的大鎮壓，大家都懂得「敢於鬥爭」是什麼意思吧。所以，這種紀念不過是拿一場勞工民主運動來為自己的專制獨裁墊底。

省港大罷工當然也有反殖愛國成分。它本來就是全國學運和工運反抗列強的高潮的一部分，而起點則是五卅慘案。1925年5月15日，上海日資綿廠工人罷工，日本大班開槍打死工人領袖顧正紅。5月30日，數千工人和學生在上海抗議，被英國巡捕在租界打死十幾人，引發全國抗議。6月23日，五萬示威者在廣州游行經過市內的沙基，被英法租界巡捕掃射，打死五十多人。很快，受過香港1922年海員大罷工洗禮的香港工會，此時立即決定罷工。同時罷工委員會宣佈從廣州全面封鎖香港進出口（因其糧食與日用品仰賴廣州）。殖民政府以軍艦護送商船偷運商品，工人就組織武裝糾察隊和法庭，從廣州封鎖香港進出口16個月，完全癱瘓香港。當時罷工領導者鄧中夏就說，罷工委員會簡直就是廣州政府之外的第二個政府。另一方面，罷工運動也是一次自下而上的民主運動，13人罷工委員會，由罷工工人代表大會選出，後者是最高權力機關。大會以罷工者人數為比例，每五十人選一代表，共計代表八百餘人，間日開會一次。¹²但省港大罷工，只是五卅所引爆的全國革命一部分。罷工委員會剛結束封鎖香港不久，同年10月23日上海工人就發動武裝起義推翻軍閥孫傳芳的政府，屢敗屢戰，第三次起義才成功，事後還把政權送給北伐的蔣介石這位「國民黨左派」（國共合作嘛）。

所以，100年前華工之「愛國」，是愛那個軍閥橫行的假民國嗎？反帝，只為趕走列強再迎來一位中國皇帝嗎？當然不是。罷工者與革命者所愛的，首先出自「愛護自己河山和家園」的樸素感情，第二呢，是追求未來理想的共和民主中國，而不是愛那個假民國。當時國共兩黨，都是成立不久。¹³陳獨秀所領導的共產黨很快就投入微薄的力量發動工運，而香港當時也有工會願意罷工，但如果沒有當時已經開始高漲的全國反帝民主運動，那麼無論國共兩黨都不足以動員這次全國反抗高潮的。從這角度來看，可說兩黨與群眾反抗，兩者一拍即合。但還有一層。中國的革命高潮本身，又是因為一次國際性社會革命高潮的餘波。第一次世界大戰是歐洲各國皇室、財閥以及其他統治集團之間的分贓戰爭，拿人民作炮灰。它在1918年結束，但不是統治者自己去結束，而是被各國反戰軍人和民眾起義/抗議才結束的。然後，這波國際革命浪潮繼續燃燒到1920年代，再燃燒到中國全境，1922年全國爆發大型罷工一百多起，香港海員大罷工只是其中一個精彩環節。這個背景也決定了工運的急速政治化。1923-25年間由國共兩黨合作發動的國民會議運動，謀求全民制憲，而當時全國工運，包括廣州工運，也積極參與。所有這些抗爭，事後才知道，亦不過是來臨中第二次革命¹⁴的預演。而五卅運動就是革命正戲前的序曲，是工人、學生、進步知識分子要民主自治的革命。人民是主體。外抗強權，內除國賊，則是主體的延申，而不是倒過來；革命政黨也同樣是群眾主體的延申而已。工聯會那種「唯黨史觀」根本顛倒黑白。

也可以說，這次革命，也是人民討債運動。1911年的辛亥革命，本來答應了民主共和，然而被袁世凱及其軍閥背叛了。十幾年過去了，現在人民要索還被偷走的國家。然而，華人的民主革命經驗實在太淺，對「革命黨會背叛革命的啊」的世界經驗所知太少。在革命高峰中，孫中山死了，國民黨變成蔣介石的國民黨，掉頭就鎮壓革命。它其後的行憲，當然也是假的。共產黨變成被追剿的「共匪」，跑到農村去革國民黨的命了。天旋地轉之後，共

產黨又推翻國民黨，又答應行憲。然而不久大家又發現，1954年行憲也是假的。建國後，工人還是沒有民主，答應給農民的土地，過幾年就被「人民公社」收回，還要為毛澤東的「大煉鋼，大辦田」餓死。無論國共兩黨，都以民主革命起家，又都背叛革命，殘民自肥。雖然，這也不等於所有這些被背叛了的革命，所有那些烈士和義人，都完全白白犧牲。不是的。100年前勞動者沒有絲毫人權可言，打死打傷工人也可以不受法律制裁。21世紀這已經不會是常態了。何況，這些背叛人民的黨，雖然可惡，不過它們也不得不繼續現代化國家，而同樣獨裁的共產黨，也的確在這個方面做得比國民黨好（雖然一樣貪污），在間接意義上有助於改善勞動者生活。承認這點也不等於要像所謂坦克左派那樣，因這點成績而去歌頌共產黨。相反，我們還是要繼續向它討債的，我們這一代討不了，就一代代人繼續追債，首先就是六四的債。

鄧中夏：大罷工的領導者和記錄者

現在回頭再談一下省港大罷工的一位傳奇領袖 — 鄧中夏（1894-1933）。他既是大罷工的主要領導者，又是它的記錄者 — 他事後寫了一本《中國職工運動史1919-1926》，主要記述五四運動前後一直到第二次革命（1925-27）中工運的重要角色，其中兩章關於香港，分別是第四章的《海員大罷工》和十三章的《省港大罷工》。他也是烈士，1933年被國民黨殺死。一個工運革命家，既領導了這次罷工，又同時寫下兩次罷工高潮，這是非常罕有的。慶幸他至少能在被處決之前幾年寫出這本書，為大家記錄了第一手資料。一百年後回望，難免發現它有一些細節上的錯誤。這本書是1930年初版。作者自己都說了，他是在大革命中寫書的，而且沒有寫完，也缺乏參考材料，大部份憑記憶，所以「脫漏及錯誤在所不免」。¹⁵其中一點錯誤，是指責陳獨秀不斷要求當時的省港罷工委員會終止封鎖香港進出口。關於這點，下文交代。

可是，如同省港大罷工一樣，中共也幾乎早已忘記鄧中夏了。我說的是真正的鄧中夏。表面上看，中共在過去70多年，不是幾次出版了此書嗎？他誕生一百周年時官方不是紀念過他嗎？2024年中共宣傳官還發表文章紀念他誕生130年呢。只不過，這篇文章和工聯會的文章一樣空洞無物，主旋律亦無非歸結為贊嘆鄧中夏如何「對黨忠誠」。¹⁶至於鄧中夏如何實踐（包括寫這本書）打工人自下而上的民主反抗專制，黨八股就完全閹割掉了。於是紀念鄧中夏的意義變成「弘揚偉大建黨精神，賡續紅色血脈」。誰最愛講「紅色血脈」呢？習近平。宣傳部為革命烈士先做了「精神絕育」，再大力宣傳紅二代的「紅色血脈」論。

即使大陸很久之前幾次出版過此書，最近20年都不見再版此書了。又即使不久將來再版，但整個詮釋權全在官僚手中，他們的口水早就淹沒那本書的精魂了。讀者只看到的是腐臭黨八股，甚至不少人從此連帶厭惡與共產黨相關的人和事，厭倦歷史，不願讀史 — 就像勞動節一樣；它早已變成單純的購物節。

誰為蔣介石編織了革命絞索？

但我們首要責任就是撥亂反正。我們首先要問：鄧中夏如果不那麼「對黨忠誠」，會不會對民主事業更好呢？甚至他本人也不至於死呢？或者死了但不是這麼委屈而死，以致死前還要先被自己的黨領袖王明折磨？

這裏扼要介紹一下背景。前文提到國共合作，才有省港大罷工。但國民黨內分為左右兩派，「右派」反對合作，「左派」歡迎合作。後者勢大，促成了合作。蔣介石最初是左派，但早在1926年3月發生的中山艦事件，他沒有調查清楚就立即解散罷工委員會的工人糾察隊並宣佈廣州戒嚴，這一切已經暴露了他要拼命抓權。再到第二年4月12日，這位「左派」國民黨就忽然變成「右派」，屠殺工人，實行政變。這一天標誌了大革命的失敗。

不久，原有的中共總書記陳獨秀被解職，繼位的幾位猶如走馬燈先後下台，但居然統統不承認革命已經失敗，反而變本加厲實行各種軍事冒險（例如1928年的廣州暴動），又幾乎無不慘敗。1931年王明接任領導人。人是換了，但路線依舊，繼續冒險奪取中心大城市，令中共的城市實力損失九成，從此中共不得不遁走農村，從工人黨變成農民黨。這是後話。

1928年，鄧中夏被派往莫斯科協助籌備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莫斯科期間，王明因不滿鄧直言不諱，指控他「反黨」。因此，鄧1930年被遣返中國，加入紅軍做政治工作。實戰經驗使他意識到，其中許多決策實屬不當。因此，他在遵守黨紀、繼續參與行動的同時，也在黨內提出批評。王明一年前已回國，1931年初時來運轉，在蘇俄暨共產國際代表帕維爾·米夫的支持下，他當選為中共最高領導人。王明隨即解除鄧中夏所有領導職務。之後鄧雖然獲派新職，卻是位低薪薄，有時溫飽難繼。即使後來他被調任為中國革命互濟總會負責人，但那個位置異常危險。1933年5月，他遭當局逮捕，並於同年9月21日被處決。¹⁷革命者犧牲，在他們而言是準備好了的。但為一個愚蠢不堪的政策犧牲，就不是很值得了。

多年來，一直到改革開放，黨史只講後來毛澤東怎樣修理王明的「左」傾冒險主義，卻不講王明不過是蘇聯斯大林的代理而已。事實上，當年中國第二次革命也好，省港大罷工也好，從頭起就不只是國內的事情。正如上文提及，這些國內群眾的抗爭，其實也是和國際革命浪潮，蘇俄和英國之間的激烈鬥爭直接相關。而當時蘇俄在軍事上援助國民黨，財政上上援助共產黨，的確促進了後二者的發展。然而，成也蕭何敗也蕭何。一旦蘇俄自身發生巨變，促進革命就變成促退了。

長話短說，如果拿人物作為標識/象徵的話，這三年的俄共，已經嚴重變質了。曾經是最前沿的許多俄國革命人物，例如托洛茨

基、季諾維耶夫和加米涅夫，現在統統被斯大林清洗了（不到十年更被殺光，托洛茨基在1940年流亡墨西哥期間也終於被謀殺）。這個巨變背後，有一個更大的巨變，那就是戰後的那次革命高潮已經大大倒退了，這種變化也幫助了斯大林崛起。1925年他已經無人能夠挑戰了，成為獨裁者。他也成為中國革命的指導者。但許多中國革命者不知道的是，斯大林是九流革命家，一流官僚，對中國更加不懂。就是這位黨領袖，要中共盲從他的政策，結果一敗塗地。

國共合作，這本身不一定錯，但方式上要共產黨加入國民黨並受其紀律約束，這就很有問題了。更錯的是，斯大林相信國民黨「左派」蔣介石和汪精衛會把國共合作革命貫徹始終。結果是蔣汪兩人先後翻臉清共，造成革命失敗。此時，比較明智的對策是反攻為守，有秩序後撤，但斯大林卻忽然從極端機會主義跳到極左冒險，再令數以萬計的工運人被殺被囚。可憐如鄧中夏那樣的真誠革命者，就被這種「人有多大膽，革命多高漲」的唯意志論拉去送死。

今日普通讀者看近代史，知道1924年國共合作，也知道1927年國共破裂，蔣介石清共等等，就以爲1921年的中共，和1927年的中共，一脈相承。其實不是的。4.12政變之後，斯大林要陳獨秀做代罪羔羊（雖然其實陳獨秀從頭到尾都反對加入國民黨）。創立共產黨的陳獨秀，在八七會議（1927年8月7日）上被開除出黨了。這時期的中共，和1921年的中共，已經不是同一個東西了。

鄧中夏的「忠誠」和陳獨秀的「反黨」

明白了王明與斯大林的故事，就不難明白爲什麼鄧中夏會在此書參與誹謗陳獨秀——不只在省港大罷工那一章批評他多次要求罷工委員會停止封鎖香港（其實根本罪責不在陳），而且在其他章節也有一些不符事實的批評。雖然，同後來中共的污衊口徑相比（污衊托洛茨基和陳獨秀都是漢奸和日本間諜），鄧書不實怪責陳獨秀

已經很溫和了。何況，當時中共黨內已無言論自由與民主可言，相反，每個支部都要例行通過決議，譴責所謂托陳反對派，不同意就開除。鄧中夏要留在黨內，就得跟從政策在此書罵罵陳獨秀。¹⁸我們不必厚責這位烈士吧。

反之，陳獨秀被開除後，這時他就一拋之前的忍辱負重，寧願堅持己見，都不願投降斯大林，在被開除之後就正式成立左派反對派，批判斯大林和王明路線。陳獨秀同樣很忠誠，不過他忠誠的對象，首先是對普羅大眾的自由解放事業忠誠，而不是對某個組織盲目服從。歸根究底，中國人對「朝代革命」很熟悉，卻對於民主革命非常不熟悉，對於「社會主義」更加陌生，只能緊跟俄共這樣一個已經開始變質的「革命黨」。這種關係有幫助中國革命一面，但更多地也在葬送它。

另一方面，誹謗污衊陳獨秀，就這樣在大陸持續了60年，直到1980年代才開始有大陸學者呼籲為陳平反，歷史學家也努力恢復歷史真相，導致官方也要放棄最惡劣的污衊。人民被騙一時，不能永遠。在華人世界，100年來至少有四場巨大的自下而上的民主運動：1925-27年的大革命、八九民運、台灣八十年代末開始的黨外運動及其餘波，以及香港一九抗爭運動。這些運動無論誰在「領導」，又無論其帶有多少錯誤，運動之成與敗，我們都必須看到百萬計的普羅大眾參與巨潮，它內在的人民和民主兩大元素，這，本來就是民主革命原意。如今，雖然在中國大陸，民主前途無比艱巨，但至少台灣人民還在對抗大陸專制，香港市民「軟對抗」還在發酵。有些人認為，歷史已成過去，今天的我們大可自由發揮。其實，歷史從來都是當代史，就是今天。共產黨首先就不會忘記自己的歷史，不是因為它始終忠於人民的革命宗旨，恰恰相反，因為它背叛了人民，所以更加著緊歷史，一方面不斷從反面吸收歷史教訓，另一方面就偽造歷史，禁止人民看到自己的真史。被欺瞞的人民如果不看真史，等於繼續被共產黨欺瞞。不，我們須讀史，辨史，吸取反抗的文化資源，來充實自己。它

偽造歷史，我們就重新發掘真史。既有往者，必有來者。黑暗時代，真史便是明燈。

這次朋友們希望把鄧中夏這本書有關香港的兩章，獨立出版繁體版，可算是香港民主運動發掘香港真史的一小步。目前所見，中港台民間網站都有綫上版，不過良莠不齊，錯漏很多。我們要拯救真相，自當包括改正錯漏。總之，這次嘗試，總會有用。更希望將來有人再版全書。走筆至此，想起陶淵明「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一句，共勉。

2026年9月7日

第一章

1922年香港海員大罷工

海員的生活狀況

中國海員的生活狀況，其最痛苦的有四：

第一，是工資的微薄。普通工資每月大概在20元以下，而物價又逐年飛漲，譬如米，1922年時，上海增加到12.5%，香港增加15%。因此，海員薪水不夠單身維持生活，若有家屬更是困苦顛連了。故中國海員中常有因生活艱難而做偷運軍火的冒險事業。但這種事業，幸而不被破獲，可得微利，不幸而被破獲，本人必須潛逃，否則必須被捕坐監或被殺。

第二，是包工制的剝削（粵語叫包工為「洗馬沙」）。海員中有所謂「館口」，約有三種：一種叫「洗馬沙館」，由包工頭設立，與船東勾結，包攬介紹海員工作。凡找工作者必須賄賂工頭數十元不等，上船作工後，海員工資中抽扣13元或15元歸包工

頭。一種叫「君主館」，由個人設立，營業性質，亦與船東勾結。凡加入者須納入館費數十元，方有候工資格。在館食宿，由館主收飯錢和徵收其他種種名義用費。介紹工人上船作工，不按先後秩序輪流，而是由館主個人意志支配。一種叫做「民主館」，亦名「兄弟館」，海員合股組織，係公共宿舍性質，自然比較公平；但海員多不識字，故必請知識分子做館中管理先生，此管理先生積久則把持館務，從中漁利，剝削工人。上述三種館口，香港一處便有130餘處之多。自然以前兩種為最有勢力，很顯然的，因包工者與船東勾結，海員不經過他則得不到工作；既得工作如不經常報效他，又隨時可以取消工作，因此海員只有忍氣吞聲受包工制的剝削。

第三，是待遇的不平等。中國海員與白種海員雖做同樣工作，並不能得同等工資，普通是10:2之比。一切待遇更是懸殊。譬如住房，白種海員，1、2人一間房，中國海員則須5、6人一間；而且中國海員住房不是火艙附近，便是空氣與光線不足之處。沿海內河輪船大半沒有海員住房，貨堆上、通路傍、煤炭裡，便是他們的臥處。其他凌辱打罵及罰金等酷虐待遇，不可勝計。

第四，是失業恐慌。自帝國主義侵入中國以後，手工業與農業破產，沿海一帶，失業農民及手工業工人，群趨大都市找工作，於是大都市裡經常的有廣大的勞動後備軍。船東與包工者恃有此經常的廣大勞動後備軍，得肆無忌憚的對在業海員施行無情的剝削。你如不願受此剝削，就把你擠出於輪船之外。香港一處，海員失業的經常總有一、兩萬人。海員失業後，就只有餓肚皮，睡馬路。

罷工的準備及其爆發

海員的經濟生活狀況既如上述，基於經濟痛苦，他們就有起來鬥爭的可能，又何況當時世界革命潮流非常洶湧。海洋輪船來

往東西洋，他們受此潮流的激動，獨得風氣之先，那有不發生階級覺悟的道理？就是內地亦發生不斷的自發的罷工鬥爭，香港機器工人罷工更給海員以眼前的實例。因此香港海員首先便掀起中國第一次罷工高潮的第一怒濤了。

1920年有寶泰辦館者，企圖包辦英國昌興公司輪船的海員僱用權，引起海員的公憤。其時海員中有蘇兆徵林偉民等積極分子，從此便乘機開始從事宣傳與組織。1921年3月6日便成立海員工會，定名為「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但中國海員籍貫既殊（最多的是廣東人和寧波人），方言亦異，鄉土觀念幫口觀念又深，當時很難團結，工會依然還是空的。但工會此時已明白，要工會取得群眾信仰必先從小鬥爭做起，於是用工會名義向輪船辦了幾次交涉，如抗議毆打海員，和要求恢復海員工作等，結果皆得勝利，因此群眾對工會的信仰日益加深，而加入者亦漸漸多起來了。不久，工會更進一步提出增加工資的問題，準備大罷工，組織「增加工資維持團」專辦此事。另組織「徵求隊」、「勸進隊」、「宣傳隊」、「防護破壞罷工隊」、「交通隊」以及各種秘密機關；並在廣州設立辦事處，預備罷工後工人回廣州，因罷工後事實上工人必須離開香港回廣州。關於罷工經費亦著手募集。又發出工人生活表及要求條件到各埠各船給海員傳觀，同時並派人到各埠各船報告工會情形及罷工準備情形。另外還聯絡外國海員要求援助；聯絡中國其他運輸工人要求援助；各國工會凡知道地址的便發信要求援助。茲將要求條件列舉於下：

- (1) 工資10元以下者加50%；10元至20元加40%；20元至30元加30%；30元至40元加20%；40元以上者加10%。
- (2) 工會有支配工人權（按：即職業介紹權）。
- (3) 僱工合同簽定時，工會有派代表權。

1921年9月，工會向資方提出加資要求，資方不答；11月又提出，又不答；1922年1月12日第三次提出，並申言限24小時內答覆，否則罷工。當工會第三次提出要求前，已約定對工會有信仰的輪船海員為領導罷工的中堅。果然不到12小時，罷工就爆發了。凡香港開往廣東內地的廣州、江門、澳門、梧州的輪船以及到港的英、荷、法、日、美各國的海洋輪船，霹靂一聲，一致罷工。當時數約一千五百人。

罷工實施後香港政府甚為失驚，因為這是出乎它的意料之外。當晚便派華民政務司（這是專門管理中國居民的官員，當然是英國人）到海員工會，帶半譏諷半威嚇的勸告，叫海員回船作工，工資將來慢慢商量。工會堅持非答應條件誓不上工，此時群眾擠滿工會內外，大家高喊罷工口號，華民政務司只得狼狽退回。

次日，罷工海員搭火車回廣州。其他輪船繼續到港，陸續罷工。這種形勢，很快的影響到新加坡，暹羅，上海等口岸。汕頭亦隨即加入罷工。有些船在半路便罷工。有些船不敢開來香港。一星期之內，罷工海員已達六千五百人。罷工總辦事處設於廣州，於香港設分辦事處，並設秘密機關。汕頭另設辦事處專管汕頭。

香港政府的恐慌

罷工之勢既成，香港政府極為恐慌。1月16日，宣布戒嚴令以恫嚇罷工工人。17日又出一通知，內中提出船主的條件以期緩和罷工。其條件如下表：

輪船種類	海員要求	船主的還價	相差
------	------	-------	----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一、沿海輪船	35%	15%	20%
二、內河輪船 (中國)	32.5%	25%	7.5%
三、其他中國的 輪船	32.5%	25%	7.5%
四、省港澳輪船 (英國)	25%	15%	10%
五、其他英國輪 船	25%	15%	10%
六、爪哇線	17.5%	12%	5.5%
七、太平洋線	17.5%	7.5%	10%
八、歐洲線	17.5%	7.5%	10%
九、澳大利亞線	20%	10%	10%

由上表看來，海員的要求與船主的還價相差實在太遠，於是海員不理，銳意擴大罷工。

的確，海員罷工可以致香港於死命。因為香港是個孤懸海口的小島，它的海上轉運業，雖在遠東是首屈一指，但是本地的出產，不能供給528,090的人口之用，所有一切糧食及一部分日用必需品從中國內地運來。譬如梧州的雞鴨，廣州的豬肉、牛肉，汕頭的水果，上海的紡織原料和服裝用品，此類日用品，都得仰海運的供給。海員罷工後，食物就驟形停頓，而物價則突然飛漲，看下表便知。

13種食物市價表			
食物 (以磅 計)	1月10日 (以元 計)	1月24日 (以元計)	增加百分 數
米	0.13	0.22	69.2%
鮭魚	0.40	0.60	50%
鯉魚	0.13	0.32	146%
鱘魚	0.24	0.28	16.7%
龍蝦	0.32	0.40	25%
蟹	0.36	0.40	11.1%
豬肉	0.20	0.26	30%
羊肉	0.34	0.40	17.6%
牛肉	0.20	0.30	50%
牛肉排	0.19	0.30	57.9%
雞肉	0.34	0.42	23.5%
雞肉排	0.32	0.44	37.5%
鴨	0.28	0.32	14.3%

註：物以磅計，銀以元計

香港運輸工人同情罷工

至1月底有香港運輸工人同情罷工的事。當海員罷工時，本擬聯絡其他運輸工會一致罷工。但運輸工會非常複雜，大半由工頭或小買辦做中心，故當時尚意存觀望。後來輪船越停越多，事實上他們已無工可作，經海員工會之活動，不到半月他們就同情罷工了。從前有一兩隻船偷偷摸摸起落貨物逃去，到運輸工人全體

罷工，則完全停頓。於是罷工人數增至三萬人以上。此時正值中國舊曆年關，香港情況更形嚴重。

2月1日，香港政府下令封閉海員工會及其他同情罷工的運輸工會，逮捕罷工領袖和工人，並架大砲對住海員工會，將工會招牌拆去，理由是：「海員工會打算陷本殖民地生命於危險之境」。

調停與破裂

香港運輸工人既一致罷工，使香港政府更為困難，對付罷工政策，軟硬兼施既均無效力，不能不出於託人調停之一道。首先唆使華工總會到廣州協同基督教青年會和中國航空業公司向海員工會調停。海員工會說：「這次罷工，香港政府不但不居中調停，反而採用高壓手段，封閉我工會、逮捕我工人，野蠻之極！我們只有堅持到底！」這場調停遂無結果。

華工總會調停既失敗，香港政府又唆使東華醫院用街坊名義出面調停，寫信到廣州請海員工會派代表到香港（東華醫院，乃留居香港的中國紳商之大集團，其名義是一醫院，其實是一社會集團，不用說是一仰承帝國主義頤指氣使的洋奴組織。故在香港頗有政治勢力。海員工會派了5個代表去，於是東華醫院調停之一幕喜劇便開場了。

此時因香港政府封閉工會，拆去工會招牌，故海員工會的要求先提出恢復工會為先決條件。紳士們說：「恢復工會是可以，是要改變招牌，添多或減少幾個字。因為香港政府煌煌文告宣布封禁，你們是知道的，這是政府的威信所關。」海員代表說：「工會招牌－『中華海員工業聯合會』一字也不能增，一字也不能減，而且要給還原有招牌。」紳士們見話不投機，乃改變態度，說起妙語來了：「你們罷工我們不反對。但你們要顧念現在香港的糧盡食絕，豈不把幾十萬留居香港的中國同胞活活地餓死。」海員代表說：「是的，香港居民將絕食，這是實情。我們早已預計到的，而且早已掛念著的。但是，我們掛念香港居民，而你們卻一點也

不掛念海員，我們海員老早就有幾十萬要餓死了。我們此次罷工，更苦得要命，天寒肚餓，你們為什麼不早就說一句救濟的話呢？」說來說去，不著邊際。海員代表聲言：「增加工資、改良待遇，是天經地義的事。而香港政府反把工會封閉，且把同情罷工的工會也封閉；還要逮捕工人，拘禁領袖，是何道理？你們為什麼只替政府說話？政府既沒道理，你們為什麼不幫助我們。你們若有本事叫政府還給我們工會招牌，就有話可說，否則我們即刻回廣州去。」海員代表立起身來要走。紳士們知難挽回，便說：「我們同去華民大人處說情，可以不可以呢？」海員代表表示拒絕，後經紳士再三要求，海員代表方允許。

到華民政務司後，華民司說：「因為你恐嚇他人罷工，故政府封閉工會，現在不能把工會招牌還給你們。恢復工會可以，但名稱要改。加資問題，你們是知道的，各船情形不一樣，將來或增或減，我們舉出代表他人按照公道評判，看哪船該加，哪船該減。」海員代表說：「恐嚇他人罷工，有何證據。用莫須有的罪名，用機關槍拆去我們工會招牌，搶去我們工會傢俱，還說我們恐嚇。中國海員罷工是多麼文明啲，你看，香港自罷工後，秩序比以前好得多（按意即謂市面蕭條）。英國煤礦鐵路海員三角罷工，我們中國海員去到倫敦，他們還要我們一同參加。現在我們還沒有邀請各國工人同情罷工哩。說到加工資，如果香港政府主持公道，早就應該調解。我們三次向資方提出要求時，同時通知政府，而政府看不起中國海員，全然不管，因此激成罷工。說到將來舉出代表公道評判解決加資問題，那我們『唔領啲咁嘅嘢』（按：即不上這個當的意思）。現在的問題很簡單，第一送還工會招牌，第二承認加資條件，我們立刻上工。如工會招牌要改，那麼加資問題也不必談了。」海員表示明天回廣州去，華民司說：「西人商會要找你們談話。」

當晚上海銀行大班，渣甸洋行大班，Wion燕梳公司¹⁹大班等請海員代表談判，非常秘密，不許旁聽。他們問：「你們願意華民司

參加嗎？」海員代表說：「有什麼不可以。」華民司亦一同參加。洋資本家說了一套與華民司相類似的話，海員代表亦用與答覆華民司相類似的答覆。說到恐嚇罷工一事，海員代表否認，華民司說：「是事實，現在許多人願回香港做工，你們強迫他們不准回來。」海員代表說：「省城太遠了。拿香港來說吧，有館口一百三十餘間，每間總有數十人，為什麼他們不肯上工？是誰恐嚇他們。」說到加資一事，海員代表說：「找公正人調查評判，我們不能接受，只有說定加多少，大家簽了條約才是實際。」說來說去，說了幾個鐘頭，海員代表堅持恢復工會給還招牌為先決條件。他們說這事要請示「兵頭」（按即香港總督，他有統率香港海陸軍的全權，故俗稱之為兵頭）。一場談判無結果而散。

到此時已是山窮水盡了，香港政府暗使華商總會約海員代表去談話，勸他們明日莫回廣州，等西商請示「兵頭」看有什麼商量？有羅旭初者，香港著名的大紳士，約海員代表到他的寫字樓去，他說：「今天的事你幾人幫我一下就可解決。」海員代表說：「什麼叫幫助？你不來幫助我們，反叫我們幫你！」他說：「一切都在你們身上，你們說什麼就可解決。」海員代表已料定羅旭初有行賄的意思，乃說：「我們什麼都取決於罷工工人，那能說在我們幾人身上。」說畢不顧他的強留而走了。

第二日華民政務司叫海員代表去，拿出公文來，大意與華民司昨所說相同。海員代表立即拒絕。說：「工人委託我們要恢復工會給還招牌為先決條件，現既辦不到，帶此公文何用？」既而說：「帶回公文也可以，但我們在此鄭重聲明，並不是接受了公文上的什麼條件。」

香港政府佈置了這一個天羅地網，假使海員代表不得其人，真的，是會落在他們的圈套中的。你不看中國的大紳士、西商大老闆、華民大老爺，從前眼角都不瞧工人的，今則這樣和順與謙恭，甚至於表露行賄的意思，如果海員代表稍一動搖，全盤糟

了。然而海員代表卻不激不隨，堅持到底，應付裕如，不能不說是難能可貴。海員代表之一就是蘇兆徵，說話亦以他為最多。

雙方的鏖戰

調停破裂以後，香港政府乃改變了策略，進行破壞罷工。派人到上海、菲律賓、印度等招集新工。上海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得此消息後，便糾合寧波海員公所阻止招募新工行動，李啟漢便因此被捕入獄。但在上海所招得來的新工幾百人，經過汕頭時便給汕頭罷工辦事處說服了一大半，一小半到了香港。有幾隻船是給新工開走了，但技術不好，在海上發生了危險。在菲律賓印度招募得來的新工，情形大致相彷彿。海員工會除通電各處工人團體請求制止招募新工外，並派「防護破壞罷工隊」暗殺招募新工者，在香港刺殺梁玉堂一名（行刺的工友被捕，工會替他打官司，一直打到倫敦理藩院，終被判決死刑，絞絕）。因此香港政府這項新策略又告失敗。

罷工海員方面的政策，便是更加加緊封鎖香港。擴大糾察隊的組織，分派到各海口去，禁止糧食運往香港，到處受農民工人的幫助，甚至小商人和土匪也起來幫助了，此時真是一莖菜，一粒米都不能到香港，香港糧食更行恐慌。從此雙方對峙的局面更加嚴重。二月中旬罷工的船隻有如下表：

英國	82隻	58，368噸
中國	36隻	30，166噸
日本	15隻	36，474噸
荷蘭	11隻	27，417噸
美國	8隻	14，529噸
挪威	7隻	8，798噸
法國	4隻	3，053噸

丹麥	1隻	1，456噸
葡萄牙	1隻	1，145噸
暹羅	1隻	998噸
總計	166隻	182，404噸

這次罷工實在太可怕了，好像時疫一樣，傳染得異常迅速，只要那船上有中國海員，並不需要工會的命令，他們便自動的離船上岸。所以各地輪船都認香港好像一時疫區域，不敢開來，或者只在港外稍停便走，或者徑直不停，由西來的直達上海，由東來的直達新加坡或小呂宋。

香港全市工人同情總罷工

調停破裂以後，香港其他工人及一般平民對香港政府皆表示憤激而同情海員。先是香港各工會曾開聯席會議，議決海員罷工，我們要大家同情援助，如運輸工人同情罷工不能勝利，則我們一致舉行總同盟罷工。海員工會此時便根據此決議向各工會大肆活動，工會都表達同情。但不能立時即罷，因香港一般習慣，工人須到月底才能取得工資，此時正是2月中旬，不能不略等些日子。各工會共派出7個代表，到廣州與海員工會商議籌備一切，並組織「全港同情罷工辦事處」。他們只提出援助海員，並未附加自己條件。

雖然如此，目前卻來了一個障礙，就是香港政府得知全港工人準備同情總罷工的消息後，便嗾使機器工會（本名「華人機器會」，是香港政府御用的機關），向工人宣傳說：「海員罷工我們應該援助，海員現在最需要的是經濟援助，我們可以捐款，不必急於罷工。」又說：「海員罷工勢成騎虎下不得背，我們可組織『全港工人調停海員罷工會』來援助他們，這才是實際。」這種宣傳居然發生極大的效力。海員工會得此消息後，即派在廣州

籌商總罷工的7個代表回港製止調停會之實現。同時海員工會召集大會，宣言：「我們工人若同情就加入罷工，不能說什麼調停？調停就是妥協」。大會一致決議不受什麼工人調停，要香港工人切勿組織調停機關。群眾異常激昂，高喊「工人兄弟團結一致」、「打倒調停機關」口號。此消息在報上暴露流傳香港後，港工人憬然覺悟，取消調停會，並將調停會的招牌和印信打得粉碎。從此便一意準備罷工，毫不動搖了。

2月27日，香港政府知全市總罷工就要到來，宣布歐戰時一樣的戒嚴令，把中國各口岸所有的英國軍艦調集香港，禁止火車通行，加崗巡查街道，離港者要舖保。香港變成戰時狀態，謠言四起，罷工海員率性放火燒了香港3個貯藏糧食的貨倉，於是全市更起恐慌，大有「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之勢。

但香港政府雖下戰時戒嚴令，然而工人並不害怕，月底領得工錢後，大家收拾被袱乘夜過海，預備天亮步行回廣州（因火車已停）。郵局、銀行、酒店、茶居、街市（按：即菜場）一律罷工，連住家的使役、女僕、廚司、轎夫、園丁以及水底電線工人、山頂電車夫、報館、印刷局、輪渡夫役、餅乾店夥友、麵包工人、公事房使喚人、牛奶房工人都加入罷工。弄得財主佬家裡，飯沒有人燒、火爐沒有人發、小孩啼哭沒有人理，全市關門閉戶，秩序大亂，全港居民都感覺是危在旦夕。然而香港政府終無如之何。只得調遣全部海陸軍警巡查街道，加緊戒嚴。

沙田慘殺

十餘萬罷工工人步行回廣州，三五成群，絡繹於道。行到沙田地方，該處有大隊英國軍警駐紮，禁止工人通過，並開槍向工人射擊。工人非常勇敢，大聲高呼：「不要怕，前進，去囉去囉！」一呼千應，聲震山岳。英兵放槍掃射，當時死四人，傷數百人，後來因重傷致死者二人，是為「沙田慘殺」。工人被英兵開槍散發後，有繞山背回廣州者，亦有迷失路途繞回的，也有中途

聞訊退回的。但退回不上工，散住街上空地或樓底，軍警見三四十人一堆的便槍擊驅散。政府禁止飯店借給成堆的工人煮飯。

香港政府滿擬此項鐵血政策可以奏效，而殊不然，反因此更促進工人憤激，不肯開工，香港居民亦更同情工人。

沙田慘案發生後，罷工海員更形憤激，誓死與帝國主義鬥爭到底。一面督促廣東政府向香港政府提出嚴重抗議，一面通電國內外請主持正義予以援助。

罷工海員的精神及其生活

我們這裡要來約略說說罷工海員的精神及其生活。當工會準備罷工時，本已籌備經費，但為數極微。所得之數不夠罷工海員回廣州的火車費。陸續回廣州的海員人數不下五萬人，後來又加上同情罷工的運輸工人和香港工人，其人數更眾多了，罷工經費當然拮据萬狀。幸而此時廣東政府每日借出數千元，前後共計約十萬元，罷工經費賴有此源源接濟得以支持（其時廣東的政像是這樣：1920年北洋軍閥發生內訌，而有所謂「直皖戰爭」，段祺瑞倒台，而成奉直的聯合政府。南方護法討段之目的既失，於是岑孫分裂，岑去孫來，另建立政府，自為總統，繼續抗北。但孫之部將陳炯明勢力益大，與孫不睦，孫不得已以廣東交陳而自去廣西之桂林督師北伐。海員罷工時孫陳衝突愈益緊張。陳炯明勢知道孫中山在海員中有相當的影響的，此次海員罷工，所以他極力表示幫助，其用意不用說在減削孫中山的影響而欲利用之以幫助自己倒孫的事業。不然，陳炯明何至有那樣慷慨？罷工海員亦非常明白這個內幕，卻利用陳炯明的經濟接濟，而始終未被陳炯明利用去作政爭）。

罷工經費雖每日有數千元接濟，但人數眾多，工人生活仍然很痛苦。每日飯食兩頓，每餐1毛。除飯食外，什麼都沒有，時值隆冬，只發棉衣一件，後來棉衣買不起，就發給蔴包。工人都在

地上打鋪，又無被蓋。剛剛此時下雨又多，道路泥濘，工人連鞋也沒有穿。冷不過了，只好燒柴火取暖。大家互相鼓勵著說：「頂硬上，兄弟！米俾人睇小！」（粵語，按即「堅持到底，兄弟們，不要給人看輕」之意）只對外省海員（如寧波海員）稍為優待，住小旅館，有棉被，每日發5分錢買香煙。

廣州罷工總辦事處分總務科、財政科、糧食管理處、糾察隊、宣傳隊、慰問隊、騎車隊、招待處等機關。設立宿舍數十所，飯室則設海中紫洞艇上。辦事很有條理，頗能照顧全局。罷工開始時蘇兆徵便是總務科主任。後來，會長陳炳生因犯私人刑事被捕，由大會公舉蘇兆徵代理會長。

此時還不知組織俱樂部扮演新劇等，罷工工人無可消遣，不下雨時就舞獅打球。後來在觀音山附近開修一條馬路，定名海員罷工路。

外界的援助

香港工人同情罷工援助，足見其階級同情之深。廣州工人援助亦極勇躍。就是遠在北方的鐵路工人，亦熱烈的援助，京奉、京漢、隴海、正太、京綏等路工人，發起「香港海員罷工北方後援會」。曾舉行許多次大會，並發出許多次通電和文告，一面向鐵路工人宣傳休戚相關之義，一面捐款援助海員罷工。最有趣的，是京漢路火車頭上豎起「援助香港海員」的大旗，從北京一直飄揚到漢口，從漢口迴轉來又飄揚到北京。這是北方軍閥專制政府下破天荒的英勇的一舉。在國外的華僑捐款也不少。各國工會也有許多電報表示慰問及援助，但都被香港政府扣留。其時廣東有一華俄通訊社，是蘇聯所組織，海員工會和它建立密切關係，每日以罷工消息報告，請其轉達各國。那時海員工會便常致電法國《人道報》——共產黨的機關報，請轉告各國工人階級予以援助。

此時中國階級分化還不明顯，小資產階級不用說表同情，就是資產階級，亦有對海員罷工表示同情，竟至以物質相援助的。

香港政府的日暮途窮

香港政府對於罷工的策略，先之以欺騙，繼之以壓迫，三之以調停，四之以破壞，最後出之鐵血，然而均不能奏效，至香港全市工人同情罷工後，更見狼狽萬狀，不得已只得令沙面英領事並派副華民政務司到廣州要求廣東政府出任調停。很哀憐的說：「香港幾十萬中國居民沒有糧食，必會餓死，我們白人在那邊並不多呢。」要求海員工會先準香港船來廣州自由採買糧食。海員工會說：「可以，你叫船來，但買不到糧食不關我們事。」果然第二日香港用海軍開一船來，但來了1天，1塊肉、1粒米都買不到手。叫艇艇不來。他們沒有絲毫辦法，只好把空船開回香港去。

海員工會知道提出解決辦法的時機已到，2月7日召集大會通過下列決議案：

（一）暫時辦法如下：

1. 工人月薪在15元以下的加40%。
2. 工人月薪在25元以下的30%。
3. 工人月薪在25元以上的加20%。
4. 必先承認後面三項原則，然後可談暫時辦法。若船主承認此項暫時辦法，海員全體即刻復工，由公斷處商議第四項決議案。

（二）公斷處設在廣州。

（三）公斷處由下列人員組織之：

1. 廣東政府代表
2. 英國總領事代表

3. 西船主代表
4. 華船主代表
5. 海員代表

公斷處人數，由廣東政府和香港政府商議後決定。這個公斷處有討論解決罷工之權。

(四) 中國海員工會提出下列8條，請求公斷處討論。

1. 工人工資在每月30元以上的加30%，在30元以下的加40%。
2. 罷工之後，復工的工人不能加以任何理由歇業或降職。
3. 工資增加適用於現在香港停泊的輪船，和從各埠向香港開駛的輪船。
4. 船主僱用海員，須由海員工會介紹，以免經手人剋扣工錢。
5. 簽立僱用海員合約時，須有海員工會派證人到場，否則無效。
6. 無論海員或海員工會的職員不得因無相當理由遞解出境。
7. 加工資日期由1922年1月1日起。
8. 中國海員復工之後，雇主須加以平等待遇，不得苛虐。

決議之後，電告香港政府，並於第四項所列8條之外，再加一條，「恢復中華海員工業總會原狀，及現被封各工會與被禁之辦事人。」

罷工的解決

香港政府此時除接受罷工海員的要求外，再也無路可走，70年來赫赫弈弈的大英帝國主義終於在中國海員的威力之下屈服

了。香港政府接獲海員工會電報後，叫沙面英領事要求海員工會派代表到香港談判。海員工會派出代表四人和廣東政府交涉署代表一人到香港。香港政府承認組織公斷處。此公斷處屢次在香港和廣州開會，到3月5日，把條件議妥，簽字解決。全文如下：

下列條件經各簽字於條約者同意，認為解決雙方爭執的辦法：

(一) 茲將1922年正月12號在香港應支之工價，須1922年1月1號起增加如下：

1. 華人內河輪船加30%
2. 其餘華人輪船在一千噸以下者加30%
3. 省港輪船公司加20%
 4. 其餘英人輪船公司（以省區港澳輪船公司之工資為底）加20%
 5. 沿岸輪船加20%
 6. 來往渣華船加15%
 7. 來往太平洋船加15%
 8. 來往歐洲輪船加15%
 9. 來往澳洲輪船加15%

(二) 須訂定一日期，以便各船員一律回船，由離工日起至一律回工之日止，工金照新定之價折半支給。各船東須用回其船員在其公司之船供職，又如雙方允肯，則安置其在別船供職亦可。如各船回工無席位，則於無席位用他期內，須折半支給工金予他。惟以由一律回工之日起計，不得過五個半月為限。此項折半之工金款項，另委管理人管理之。

(三) 各船東允願襄助實行一個新的僱用船員辦法，以便盡量減少一切關於付船員工金之弊病。

關於工資一項，其百分比，結果如下表：

	解決條件	海員要求	相差
沿海	20	35	15
內河（中國）	30	32.5	2.5
其他中國船	30	32.5	2.5
省港澳（英國）	20	25	5
其他英國船	20	25	5
爪哇線	15	17.5	2.5
太平洋線	15	17.5	2.5
歐洲線	15	17.5	2.5
澳大利亞線	15	20	5

除上列條件之外，恢復原有工會，釋放被捕工人，沙田慘案死者每人優卹一千元，也答應了。

總而言之，這次罷工算是得到勝利。自1月12日起，至3月8日止，共罷工56天。

慶祝罷工勝利

罷工勝利之後，工友們自然欣喜奮發，首先就在廣州舉行慶祝大會，隨後回香港又舉行慶祝大會。會中情形，略而不敘，我們這裡只簡單敘一事，即啟封工會時之盛況。海員工會招牌曾被

香港政府拆去，3月6日，香港政府只得明令取消2月1日封閉海員工會的命令，工會招牌亦只得恭恭敬敬地給還海員。當重新掛上工會招牌時，罷工全體海員及香港全市工人都來慶賀，人數不下十餘萬人，把街道擠得水洩不通，在高呼「海員工會萬歲」的歡聲雷動中，一致仰著頭，看招牌徐徐地掛上去。爆竹連天，聲震全港。

這次罷工的教訓

香港海員此次罷工，其性質雖純是要求增加工資的經濟鬥爭，然而其實際卻帶著反抗帝國主義的政治意義，因為中國航業幾乎全是外國資本經營，中國民族資本、遠洋船一條也沒有，沿海內河船也不及外資公司三分之一。所以中國海員與帝國主義有不可避免的衝突，成了直接的仇敵。這是中國海員鬥爭的特殊意義。

這次罷工勝利的原因，在客觀上當然是當時國內外革命潮流的激盪，是一個利於鬥爭的環境；在主觀上則為罷工有相當準備；選擇的時機適當（中國舊曆年關），群眾完全了解並興奮；團結力甚強；領導者聰明而堅決；援助力量有莫大的作用（運輸工人甚至全港工人的同情總罷工）；應付策略的適宜（特別是封鎖香港的飢餓政策）等。

這次罷工的弱點，不在於罷工時而在於罷工後，罷工勝利了，一般領袖和陳炳生、翟漢奇之流，由驕傲而至於腐敗，再進而把持會務，盜用會款，變成工賊了，工會變成空虛無力。帝國主義見此弱點故敢把親手簽定的條約悍不履行，實際上勝利條約等於一張廢紙。以致到了後來1924年，工人群眾不能不起來做驅逐工賊運動，而把蘇兆徵（罷工勝利後仍回船作工）從船上叫了回來整頓工會，方逐漸恢復舊觀。但勝利條件帝國主義至今仍未履行。

雖然如此，這次罷工在當時總算是勝利的，它的影響，及於全國，所以它在中國職工運動的歷史上的意義便特別重大了。

這次罷工還有另一結果，就是影響廣東政府把中國刑律中關於罷工治罪之條文明令取消。

第二章 1925-26年 省港大罷工

罷工的準備

省港罷工是為了抗議1925年上海「五卅」慘案而起，延續了兩年多之久，成了「五卅」以來反帝國主義長期潮流之最後砥柱。罷工繼續到這樣長久的歲月，詳細敘述所佔篇幅太多，我們這裡只能將這次罷工擇要的作簡括的敘述。

省港罷工未能繼上海「五卅」運動立時發動，原因是廣州此時發生劉楊戰爭²⁰。廣州正在準備戰爭狀態中，故中華全國總工會接到上海「五卅」慘案消息後僅只能召集一次示威的群眾大會，還不能有省港罷工的決定。雖然如此，但全國總工會已準備在劉楊戰爭告終之後，必須號召這個罷工以回應上海。故當戰爭方殷之際，就派代表到香港去準備。

當時香港的情形是這樣：工會雖有百餘，但不是黃色工會，便是行會工會。海員工會雖有我們的影響，特別是林偉民、蘇兆徵兩同志相繼加入共產黨後，我們在海員工會中的影響增加，但該會會長還是一個極右傾的分子。香港的共產黨員，此時還不滿

十人，而多為最下層的碼頭工人，共產主義青年團員雖比黨員多幾個，但多數為學生。很顯明的，如以我們主觀力量估計起來，罷工能否發動，確無把握。我們當時鼓動這個罷工是從上下兩方面著手，一方面在各工廠散發傳單，一方面與各工會領袖接合。此時上海反帝革命高潮風起雲湧，這種影響給予香港工人極為巨大，果然，不到數日，我們的鼓動工作生效了，罷工情緒繼續增高。當時我們最困難的是香港工會的不統一，我們在十一章便已指出。當時香港工會大別為三派：

- (1) 工團總會派，包含七十幾個工會，多屬手工業，就中海員工會為一大產業工會；
- (2) 華工總會派，包含三十個工會，亦屬手工業，重要的只電車工會；
- (3) 無所屬派，約二十幾個工會，卻多是大工會，如機器、起落貨、煤炭、洋務等工會。

在這樣分立狀況之下，罷工如何能夠一致！幸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成立了中華全國總工會，香港各工會是參加過勞動大會的，故對於中華全國總工會的代表頗有信仰。於是全國總工會之代表召集各工會代表聯席會議，公然罷工竟在此次會議上無異議通過，還透過罷工宣言與罷工要求。過一日又開第二次聯席會議，組織罷工的統一指揮機關，定名為「全港工團聯合會」並選定職員。

上面說過，香港工會不是黃色工會，便是行會工會，為什麼這些黃色領袖會贊成罷工？這因為黃色領袖有他們自己的企圖與希望。這班黃色領袖其實是些百業不居的分子，以抽收會費為生，他們以為參加罷工，與自己並無不利，因為罷工之後，領導權握在手中，一方面固可取得愛國虛榮，一方面又可取得剋扣罷工經費的實利，所以他們贊成罷工。這一點我們當時是估計到的，所以在香港與這些黃色領袖計議罷工時，關於他們爭奪罷工

指揮機關的位子，我們當時取放任態度，因為那時如要香港罷工實現，的確少不了他們，除去了他們，罷工便會被搗亂。我們所需要的是罷工實現，故對於他們一時不能不採取容忍策略。雖然如此，但黃色領袖事到臨頭終於畏縮起來了，向我們提出許多難題：第一個是罷工工人的宿食問題，他們說劉楊戰爭未平，罷工工人何處取得宿食？我們解答：劉楊戰爭三日內可平，回廣州宿食不成問題。果然削平劉楊的消息第二日便證實了，但黃色領袖還不相信宿食問題有把握，一定要派代表到廣州接洽，其時劉楊戰後，廣東政府接受共產黨的提議，贊助香港罷工，因此香港工會派去接洽的代表得到滿意的答覆。第二個是如何應付香港政府封鎖出口問題，他們說：香港政府如下戒嚴令，停開火車，罷工工人不能出口，怎麼辦？我們解答，即使火車停開，尚有好幾條水路與旱路可回廣州，萬一香港政府真的封鎖水陸交通，我們起來暴動，我們有全世界工人的同情與援助。到最後，第三個難題來了，黃色領袖提出罷工程序問題，他們主張分批罷工，其畏懼罷工更明顯了，我們極力主張同時罷工。在會議上，他們勉強通過我們的主張，但我們已預料到黃色領袖必然怠工。在此千鈞一發之際，當晚共產黨黨團開會決定，先由受我們指揮的各工會（海員、電車、華洋排字、洋務等工會）先行罷工，再來逼迫黃色工會罷工。於是這偉大歷史意義的省港罷工，就在這個決議之下，於1925年6月19日晚實現了。

罷工的爆發

未罷工以前，香港各工會聯名送給香港政府公文一件，敘明罷工理由，並臚列罷工要求條件，分兩大綱：第一綱，擁護上海工商學聯合會之十七條件；第二綱：對香港政府要求六項：

- (1) 政治自由；
- (2) 法律平等；
- (3) 普遍選舉；
- (4) 勞動立法；

(5) 減少房租；

(6) 居住自由；

宣布罷工時，發表宣言，大意如下：

「中國自從鴉片戰爭之後，帝國主義除了經濟的政治的文化的侵略以外，還要加以武力的屠殺，是而可忍，孰不可忍！故我全港工團代表聯席會議，一致決議與上海漢口各地取同一之行動，與帝國主義決一死戰。我們為民族的生存與尊嚴計，明知帝國主義的快槍巨砲可以制我們的死命，然而我們亦知中華民族奮鬥亦死，不奮鬥亦死；與其不奮鬥而死，何如奮鬥而死，可以鮮血鑄成民族歷史之光榮。所以我們毫不畏懼，願與強權決一死戰。」

6月19日晚起，香港如大地震一樣，罷工爆發了，海員、電車、印務首先發難；接著是洋務、起落貨、煤炭工人以及各種工人相繼而起，最後是機器、船塢工人亦相率罷工，前後約15日，完全罷盡，罷工人數約二十五萬人，罷工局勢遂以大定。工人紛紛搭火車、輪船由前山、江門、三水河口分道回廣州。

廣州沙面洋務工人亦同時罷工。

這裡須略略補述，上面說過黃色領袖事到臨頭便畏縮起來，真的，如果不是海員、電車、印務首先發難，罷工一定發生變化，事實上黃色領袖對於同時罷工之決議案怠工，一直到後來影響所及，工人群眾紛紛自動罷工，才不得不跟著走。所以共產黨黨團決議是正確的。最有趣的是，海員工會會長是一極右傾的分子，對於罷工，臨時發生動搖，海員逼著他下罷工命令，說：「下不下，不下以老拳奉送。」因此他不得不下罷工命令了。更有趣的是，香港機器華人會本是香港帝國主義之御用機關，對於各工團聯席會議始終拒絕到會，罷工發生以後又始終不肯下罷工命

令，但是其屬下的機器船塢工人群眾，卻不待工會罷工命令，紛紛自動罷工，這就是機器船塢工人罷工獨後的原因。

香港政府事先對於罷工本有所聞，密探四出，捉拿領袖，並佈告說：「上海事件與本港無關，工人應安心樂業，不得妄動，妄動者嚴懲不貸。」但這種恐嚇，對於罷工工人，絲毫不會產生影響。罷工發生，香港政府一時手忙腳亂，宣佈歐戰時的戒嚴令，宣布禁止糧食出口令，宣布禁止金銀圓塊紙幣出口令，海軍陸戰隊全體登陸，軍艦升火往來海面巡邏，香港頓時陷入戰時狀態，但工人卻萬死不辭，蜂擁離港。

沙基慘殺

罷工工人紛紛回廣州，6月23日偕同廣州市工人、四郊農民、青年軍士、學生共十萬人舉行大示威遊行，當路過沙面租界對岸之沙基時，英法帝國主義命令水兵巡捕在沙袋背後瞄準遊行群眾，開放機關槍掃射，同時，兵艦發砲示威，25分鐘後，五十二個中國人當場被槍擊身死，重傷者一百七十餘人，輕傷者無數。上海、漢口、青島等處大屠殺，又重演於廣州。但帝國主義這樣一來，卻更激起中國群眾反抗的決心，於是各界人民更表示熱烈援助省港罷工。

罷工工人的組織

罷工工人到達廣州以後，中華全國總工會召集香港沙面各工會代表大會，當通過罷工委員會的組織法。罷工委員會以十三人組織之，香港方面九人，沙面方面四人。罷工委員會之上為罷工工人代表大會，以人數為比例，每五十人選一代表，為最高議事機關。共計代表八百餘人，間日開會一次。罷工委員會之下設幹事局，分置文書、宣傳、招待、庶務、交通、交際、遊藝七部。另設財政委員會，籌措保管罷工經費。後來又添設會審處，為審判破壞罷工，私運糧食，偷賣仇貨之走狗的機關，並有監獄，拘

禁犯人。設保管拍賣處，為保管及拍賣被糾察截獲仇貨的機關。設立法制局，為起草各機關組織法及各種辦事細則的機關。設審計局，為審核各機關開支帳目的機關。設築路委員會，為管理修築馬路事宜的機關。另有糾察隊（見後）、水陸偵察隊、罷工工人醫院、宣傳學校等機關。又設工人飯堂、工人宿舍，封閉原來之賭館煙館及所有廣州市空屋充之；分全市為八區，每區設登記處，罷工工人登記後領得憑證，分往宿舍住宿，至於吃飯則只要有憑證及飯票，到處可以吃飯。到後來，還添設不少機關，不能詳述。真的，這個罷工委員會，按其實際，實不啻一個政府，它有絕對權力，可以處置一切與罷工相關之事，廣東政府不得過問，所以後來香港帝國主義宣傳廣東有「第二政府」，就是指此。

罷工委員會委員長就是蘇兆徵同志。原來當大會通過罷工工人組織法時，黃色領袖力持異議，首先反對組織統一的罷工委員會，謂香港沙面應各有機關各辦其事，但是遭大會的打擊而失敗。繼則反對代表大會以人數做比例，謂應以工會為單位（黃色工會多半是手工業的小工會，人數不多），亦遭大會的打擊而失敗。三則中華全國總工會向香港工會提出希望：罷工委員會中香港方面之九人，應包含海員、起落貨、機器、煤炭、洋務各一人及工團總會、華工總會務二人，他們又反對，主張自由選舉，但選舉結果全國總工會的希望完全勝利，他們又失敗。因此黃色領袖著著失敗，他們在香港時之一切企圖，到此皆空。蘇兆徵同志被群眾擁護起而充當委員長。

我們對於黃色領袖的策略，在重要地方雖不讓步，但在次要地方亦可放任，比方在香港發起罷工之指揮機關——「全港工團聯合會」，我們聽其存在，月給津貼。各部亦網羅他們參加辦事，設法分化他們。這些黃色領袖在罷工過程中，營私舞弊，層見疊出，後來經代表大會——加以懲戒，有不少還被逮捕送會審處，處以有期徒刑。

我們須特別指出的，是這次罷工，這個八百餘人的代表大會的確起了不可思議的偉大作用。罷工策略經過集體的討論，因而取得一致的團結。罷工內部許多糾紛，都依賴代表大會的威權來解決。黃色領袖以及一切反動分子之陰謀企圖，都受到代表大會的嚴厲制裁。工人群眾的一切意志，都經過代表帶到代表大會。罷工消息又經過代表帶入工人群眾。罷工委員會的會務及財政，皆經常在代表大會報告，以致外在一切謠言都失其效用。罷工各機關重要職員，都經過代表大會選舉，不稱職時又經過代表大會隨時撤職，因此罷工各機關不致腐化。真的，代表大會奠定了這次罷工。這個經驗我們是在這次罷工中第一次取得的。

再須附帶提及的，是罷工委員會一切權力都有，只沒有殺人權，正因為此事，當時曾發生一場激烈的鬥爭。原來罷工後，香港帝國主義派遣大批走狗，混入廣州，造謠搗亂，破壞罷工。有林和記者，運動海員復工，會審處以其情節重大，判處死刑。此消息傳出以後，廣東檢察廳長以「尊重法律，保障人權」、「破壞罷工，罪不至死」為辭，提出抗議。罷工工人大憤，以為這次罷工，是反帝國主義的革命的非常時期，不能以普通法律，寬宥國賊。結果是由廣東政府另組「特別法庭」，處斷此等人犯。

封鎖香港

封鎖香港本是1922年海員罷工的舊經驗，故罷工工人一回廣州，各工會即紛紛自動組織糾察隊封鎖香港。罷工委員會成立以後，乃統一各工會糾察隊，加以整理與擴充，設總隊部，置總隊長一人、訓育長一人，為全隊主腦（後來改為七人的糾察委員會）。設總教練一人，施以軍事訓練。下分五大隊，每大隊置大隊長一人，大隊副一人，訓育主任一人。每大隊下分三支隊，各隊置支隊長一人，支隊副一人，訓育員一人。每支隊下分三小隊，每小隊置小隊長一人，每小隊下分三班，每班置班長一人，每班十二人（這個編制後來略有變更）。糾察隊起初總數為兩千餘人，

後來還有擴充。糾察隊的責任，為維持秩序，逮捕走狗，截留糧食，扣緝仇貨。糾察隊佈置以後，分派到各海口駐防。因此省港交通完全斷絕，繼以澳門因附和香港，交通亦宣告斷絕。當廣東尚未統一時，糾察隊封鎖線還只限於珠江口一帶，東起深州，西抵前山。後來廣東政府收復東江南路，糾察隊的封鎖線也擴張了，東至於汕頭，西至於北海。廣東沿海港口皆有糾察隊駐紮，蜿蜒數千里，旌旗相望，金鼓之聲相聞。糾察隊還有小艦十二艘，電船數隻，往來巡查。糾察隊槍枝號稱四百餘支，實只二百餘支能用（我們當時為增加槍枝，不知花了若干氣力，結果增加不多）。香港便在這樣封鎖之下，肉食菜蔬，無從取得，豬肉漲至一元餘一斤，雞蛋漲至五角多一個，牛肉幾乎絕跡，街市等於虛設。街上垃圾糞穢，堆積如山，樓居者以紙包糞，拋擲街中，加以暑日炎蒸，臭氣熏天，故當時群呼香港為臭港。但是最使香港痛苦的，還是經濟上受到空前未有的大打擊。

香港經濟上的空前損失

當沙基慘殺後，沙面英國領事送來一函，大意是說：「你們抵制英貨好了，何必罷工！」當時我們頗為詫異，繼乃考察《中國海關貿易冊》，則知香港每年出入口貨值為一億五千萬金鎊，約合華幣二十五億二千萬元。罷工以後，航業商務概行停止，平均罷工一月，損失兩億一千萬元，罷工一日，損失七百萬元。但英國貨每年輸入廣州者不過三、四千萬元，這樣罷工五、六日，便抵得排貨一年。罷工是如何有力量的武器呀！於是我們堅持罷工排貨與封鎖，以與香港帝國主義相周旋。

真的，香港自被封鎖以後，經濟上受到空前大損失。我們根據當時香港報紙自己披露的消息，就看得出來。

就輸入輸出來說。1924年輸出為八百八十一萬鎊，1925年只得四百七十萬鎊，相差四百十萬鎊。1924年秋季入口稅，總數為

一千一百六十七萬鎊，1925年秋季則降落至五百八十四萬鎊，相差五百八十三萬鎊。總之，輸出輸入，1925年皆只得1924年之半。原因是這樣的，香港出口貨中，四分之一往中國北部，四分之一往南洋群島，四分之二往中國南部，香港罷工工人封鎖以後，即使中國北部與南洋群島未被封鎖，但中國南部是被封鎖了的，所以輸出輸入皆損失一半。

我們再就其他方面來說，都可證明香港經濟上的損失。例如航業，1924年到港船數為七萬六千四百九十二隻，共噸數為五千七百萬噸，平均每日有船二百一十隻，共噸數為十五萬六千一百五十四噸。但自1925年7月起計算，平均每日僅有船三十四隻，噸數為五萬五千八百一十九噸。1925與1924年比較，船數減少5.5倍，僅得1924年16%；噸數減少1.8倍，僅得1924年36%。

再如商店破產。罷工後，香港報紙與政府通告，每日必有商店報窮案。光是1925年11、12兩個月，計破產的店家已達三千餘家。

又如銀行。罷工以後，存款斷絕，提款突增，紙幣被抵制，現金流出。雖然當時香港報紙對於銀行損失，諱莫如深，我們無從考察，但股票是低跌的，如1925年6月22日至10月19日，匯豐銀行股票，由一千二百九十元跌到一千一百四十元，已減少11.5%。

又如政府收入。罷工以後，出入口貨稅固然損失大半，地價也跌到十分之五，房租又跌到十分之四。稅收固然銳減，同時開銷卻又銳增，因為政府要應付罷工風潮，軍備等項突然增加。真的，香港政府當時把常存不用的存款一千七百萬元，都從銀行提出來用了，並提出制定新預算，高唱「裁員減薪」。

也就因此引起香港帝國主義對於廣東的憤恨，7月27日，召集什麼公民大會，電請倫敦英皇，立即出兵攻打廣州，驅逐「過激

黨」，說廣東人都是「過激黨」。後來8月15日，又召集公民大會，以前次電報，英皇不理，乃改電首相，意態極其憤懣，仍請立時出兵。但當時英國倫敦政府因本國無產階級之不穩，各殖民地之蠢動，各帝國主義間之衝突，有此種種原因，所以對於香港什麼公民大會之答覆是：「香港困苦，倫敦至深繫念，惟統觀全局，現時無法出兵。」英國倫敦政府當時借給香港三百萬鎊，為救濟商業之用。但當時有名的演說家哥爾就說：「這次借款，只不過救濟香港危機於一時罷了」；香港此時真是陷於絕地。罷工、排貨、封鎖，這是如何有力量的武器呀！

國民政府的成立

罷工以後，廣州當時的政治情形是這樣：劉楊雖被削平，但東江又被陳炯明佔領，南路仍被鄧本殷割據，就是廣州內部各派軍閥亦是擁兵自恣，各有異志，總之此時廣東仍是四分五裂的狀態，仍然是處於內憂外患岌岌可危的環境。幸而有這次罷工，十餘萬革命工人，集在廣州，表示擁護革命政府，當時國民黨左派，也為之氣壯，採納共產黨的提議，重建新政府，即國民政府，宣布新政綱，主張軍政統一，財政統一，民政統一，各軍受政治訓練，軍需獨立。如此一來，廣東內部即起分化，主要分成三派：

- (1) 一派以許崇智為首，而魏邦平、梁鴻楷及所有粵系軍官屬之；
- (2) 一派以胡漢民為首，而一般官僚政客屬之；
- (3) 一派以廖仲愷、汪精衛為首，而左派黨員及工農群眾屬之。

共產黨不用說是贊助最後一派。新政府成立了，但三派之明爭暗鬥，也愈趨愈烈。胡許兩派陰謀政變，首為罷工委員會查覺，於是召集罷工工人於8月11日舉行肅清內奸大運動，遊行示威，其意即在於壯國民黨左派之膽，實行斷然處置，但國民黨左

派當時卻極其動搖，慄然不動手。此時胡許兩派公開宣傳「反共產」（其實劉楊叛變亦以反共產為口號），情勢更為嚴重，一直到8月20日廖仲愷被刺，國民黨左派方下最後決心，解散梁鴻楷、魏邦屏的部隊，並下令捕拿胡毅生、朱卓文諸人。在軍事行動時，罷工工人為軍隊作偵探與嚮導，盡力甚多。隨後驅逐胡、許離粵，許崇智則以「請假赴滬」為名，胡漢民則以「出使蘇俄」為名。廣東政權從此完全遞入左派之手，此一時期，可說是左派執政時期。

此時罷工工人與國民黨政府真是相依為命，有存則俱存、亡則俱亡之勢，內外環境更為惡劣；在廣州，謠諑繁興，反側蠢動；在全省，陳炯明陷落惠州，鄧本殷攻江門，中山縣被土匪佔領；在省外，香港勾結北艦南來，資助陳、鄧反攻。於是罷工工人援助國民革命軍東征與南征。

在東征與南征的時候，罷工工人組織運輸隊，運送輜重接濟前線；組織宣傳隊，隨從大軍前進，向農民宣傳；組織衛生隊，救護戰場傷亡戰士。罷工糾察隊請纓出征，上陣殺賊。政府囑咐其鞏固後方。真的，國民革命軍得罷工工人之助，行軍迅速，東征軍一鼓而下惠州，再鼓而佔汕頭，東江依次收復。南征軍一鼓而平高雷，再鼓而入瓊崖。商路也依次底定。前後不過三個月，廣東全省統一了。

當時中國國民革命唯一的根據地，就在罷工工人幫助之下完全鞏固了，以至於能再準備力量，而有後來之出師北伐。

罷工的中心策略

罷工的前兩個月，因封鎖香港，海外交通完全斷絕，任何國家輪船皆不准其出入廣州。這樣一來，這種封鎖不只封鎖了香港，而且封鎖了我們自己。

因為廣東米糧向來仰給海外，以香港為總轉運之門戶，如不溝通海外直接航運，勢必自困；再則廣東工業尚不發展，貨品無以自給，特別是燃料缺乏，如不溝通外埠直接運來，亦是自困。另外還有兩個問題須得解決：一個是商人營業問題，很顯明的，沙基慘案之後，愛國空氣高漲，一時商人停止貿易，尚可隱忍；時過境遷，熱潮低降，商人非要求貿易不可。再一個是帝國主義聯合問題，也是很顯明的，英、美、日帝國主義年來爭奪廣東市場，極為猛烈。據《中國海關貿易冊》的數字，英貨逐年遞減，日、美貨則逐年遞增。廣東排英，在日、美自然認為是取英而代的絕好機會，如廣東抵制一切外貨勢必逼成日、美與英協同對我。罷工委員會有鑑於此，於是決定一種「特許證」制度，訂定「凡不是英國貨英國船及經過香港者，可准其直來廣州」。此特許證由罷工委員會、商務廳、公安局、外交部共同簽字發出。這個特許證實行後，真的，上海、暹羅等處商船聞風而來，美國大來公司、日本三井洋行及各國商船亦要求領證復業。於是上海廣州間之航線，暹羅與廣州間之航線，直接打通，廣州江面，每日有四十餘隻船入口，為廣州有史以來所未有的現象。

這一個「凡不是英國貨英國船及經過香港者，可准其直來廣州」之原則，是省港罷工的中心策略，真的，在這個中心策略之下，解除廣東經濟的困難，保持廣東商人的中立，拆散帝國主義的聯合戰線，最後還促進廣東經濟的獨立發展，使這個偉大的罷工，得以堅持如此長的歲月，就是由於這個中心策略之正確。

工商聯合

這裡我們要說到當時廣東商業資產階級對於罷工的態度。當罷工開始時，特別因為發生沙基慘殺，商業資產階級為愛國空氣所降住，當然不敢公開反對罷工，同時也不贊助罷工，譬如罷工開始時，我們要廖仲愷（當時他身兼國民政府財政部長和廣東省政府財政廳長）召集全市商人開會，商量捐助罷工經費，結果是

商人只捐數千元敷衍面子。罷工委員會自動宣布特許證制度後，商業資產階級才乘機向罷工委員會進攻，原因是此時正是胡、許兩派陰謀政變，政局杌隉不定，我們內部裡極端困難的時候，他們看清了這一點，受胡、許兩派的指使，於是挺身出來反對特許證制度。問其所持理由，則曰「手續麻煩，手續費太重」。罷工委員會認為這是枝節問題，手續可以力求簡單，手續費亦可准予減免，但不能取消特許證。商人仍堅持反對，主張根本取消。不久廖案發生，政府斷然處置，解散反動軍隊，通緝反動政客，驅逐胡、許出境，政府轉危為安。罷工委員會又自動取消特許證，並提倡「工商聯合」，邀請四商會共同商議善後辦法。罷工委員會提出仍以「凡不是英國貨英國船及經過香港者，可准其直來廣州」為原則，訂立工商善後條例，共同蓋章，張貼佈告，以資遵守。以後只在罷工委員會領取輪船出入口證，不須經過商務廳公安局外交部等機關簽字，手續費一律減免。商業資產階級見我們鎮壓反動如此神速，政局突然安定，又見我們自動取消特許證，已無可藉口，對於「凡不是英國貨英國船及經過香港者，可准其直來廣州」這一原則，當然不便反對，如反對無異自承為英帝國主義走狗。因此商業資產階級完全接受罷工委員會的提議，罷工委員會與四商會聯名蓋章的皇皇佈告遂貼滿街上了。

的確，從此以後，商業資產階級對於罷工不僅不反對，而且相當贊助，這不是他們革命性的表現，而是有經濟的原因。原來廣州自與海外直接建立交通以後，商務突然興盛，不僅比罷工開始時興盛，而且比沒有罷工以前還要興盛。茲將粵海關1925年7月罷工以後各月份收入統計，與1924年同月份的作一比較：

	1924年	1925年	1926年
月份	(以海關兩計) ²¹		
7月	229.523	70.71	

8月	281.816	150.180	
9月	289.632	232.407	
10月	242.078	306.125	
11月	319.835	337.532	
12月	282.564	304.838	
1月		257.541	422.971

觀上表，可看出，7月罷工初起時，海關收入較1924年同月份少三分之二，此時商務可說極壞，但自10月與海外直接建立交通後，則不僅完全恢復原狀，且逐月均有增加，1926年1月比1925年同月，超過五分之三。為什麼呢？第一，因為廣州與海外直接建立交通，第二，因為廣州與香港澳門交通斷絕，而且內地向來向港澳直接採辦貨物者，現在都改向廣州採辦，廣州之批發商業乃驟然興盛；所以當時資產階級的報紙也說：「此種情況，誠出一般人意料之外也。」這樣，罷工不僅不妨害廣州商務，而且大有造於²²廣州商務。這就可以解釋當時廣州商業資產階級能夠接受罷工委員會「工商聯合」的口號，甚至於到1926年1月，香港政府不接受罷工條約時，廣東四商會開大會，義形於色的做決議說：「此次罷工為人民自動，出於愛國運動，爭回國體與人格，各工友如此犧牲熱烈，我等商人也應聯合一致熱烈援助，務求達到香港完全承認復工條件為目的。」

國民黨與這次罷工

這次罷工是由共產黨發起而成的。究竟國民黨對這次罷工取如何態度呢？這裡須得加以敘述。在罷工發動的開始數日，共產黨中有一部分同志，有這樣一種機械論的見解，說：「共產黨是

無產階級的政黨，罷工是無產階級的事情，所以省港罷工應完全由共產黨獨立領導，不要國民黨來過問；國民黨來過問便會奪去領導權。」其實領導權共產黨人是不是會失掉，那要看共產黨在罷工工人群眾中的工作是不是努力才能決定，拒絕國民黨過問是不能保證共產黨對罷工領導權的鞏固的，並且這種拒絕國民黨過問，實際竟拒絕國民黨幫助，假若當時不取得國民黨幫助，的確罷工不到一個星期便要倒台。試問十幾萬人的伙食經費從何取得？無疑的這種機械論的幼稚見解是不對的，立刻被黨否決。不僅要國民黨過問，而且要拉國民黨來過問，這樣才能取得國民黨目前迫切的物質幫助，這與領導權問題全是兩件事。的確當時國民黨因劉楊戰爭剛畢，新勝之餘，對於民眾運動極為援助，特別是劉楊戰爭之中，鐵路工人與海員工人罷工給予他們軍事上很大的便利（請參看下一章²³），所以使得他們懷好感。省港罷工起，共產黨要求國民黨經濟援助，他們很慷慨的承認而且實行了。

後來才接各方面的捐款。從罷工開始到1926年6月，罷工委員會收入是這樣：國內捐二十五萬元，海外華僑捐一百十三萬元，租捐及政府收到各方捐款二百八十萬元，殷實紳富捐二萬元，拍賣英貨四十萬元，罰款二十萬元，其他二十萬元，共四百九十萬元。

的確，國民政府財政部，自始至終是每月送給罷工委員會一萬元。

當然國民黨內部對於罷工的態度是不一致的：右派是始終反對，左派在罷工的頭半年的確是熱誠擁護的。左派擁護罷工的原因，在政治方面，我們在上面已經說了許多，很明顯的他們那時完全要依靠工人幫助才能把握政權，故不能不擁護罷工。在經濟方面，我們來多說幾句話。

自罷工以後，國民政府的收入，也增加了。1922年，廣東全省收入為一千萬元，平均每月為八十三萬三千元。1924年收入僅七百九十八萬六千元，平均每月為六十六萬五千元。1925年罷工以後，8月收入為一百五十萬元，已比前兩年每月收入之平均數增加不少。到10月，收入達到三百六十一萬六千元。11月收入為三百八十萬元，則較前兩年每月收入之平均數多至6—7倍了。

為什麼呢？因為一方面是由於廣東統一的影響，但另一方面則因為省港罷工，斷絕與香港交通，把大門關住，好讓政府來從容的有計劃的從事財政的整理。原來廣東經濟向來是受香港所操縱和支配。比方廣東政府所設立之中央銀行，孫中山在時，舌敝唇焦要求人民信任他們紙幣，但結果經不起香港紙幣之操縱，使得中央銀行紙幣價格起落不常，信任動搖。直到罷工以前，中央紙幣一元還只當三、四角。罷工以後，加以沙基慘殺，於是廣東人民抵制香港紙幣，又兼封鎖，故香港紙幣當時幾乎絕跡於市面，而中央銀行乘此加以整理，再不受香港紙幣的操縱，因此信用恢復，營業擴張，紙幣變為十足十用。舉銀行就可以概其餘。

從上述的事實，就可以解釋當時左派政府為何熱誠擁護罷工；又何況政府每月送給罷工委員會的一萬元，事實上是政府從各方面收得的罷工捐款，慷他人之慨，於已毫無所損，又何樂而不為。

但是這些左派，到1926年1月以後，對於罷工就有些冷淡了，當然廣東統一了，不再需要罷工工人了，又加上右派借罷工如何「不法」的誣衊事實，專門與左派為難，小資產階級動搖的根性發作了，遂日益與罷工工人離開。

1926年3月20日政變²⁴，代表民族資產階級的新右派掌握政權以後，無疑的是反對省港罷工，其所以不敢斷然解散罷工者，因他們自己力量還感覺不足，一時還不能脫離無產階級，因為省港

罷工到此時確已形成一個堅固的力量，而且是正在與帝國主義鬥爭著，無端解散罷工，於力固所不能，於理亦所不順。

香港帝國主義態度的改變與廣東政局

香港帝國主義對於罷工的態度經過好幾次的變化，這些都與廣東政局有關。

第一期，強硬時期。罷工開始時，香港方面²⁵急於在求一戰，所以他們的什麼公民大會兩次電求倫敦，出兵攻打廣州。出兵被倫敦否決後，香港則專心一致實行「以華制華」政策：一方面勾結北方軍閥侵粵，一方面勾結廣東內部一切反動勢力作亂。第一著便是香港暗中資助胡、許兩派政變，文華堂二百萬元之賄賂，江門梁鴻楷部隊新軍械之發現，皆其鐵證，於是而有廖仲愷的被刺。但因為當時共產黨幫助國民黨左派實行斷然處置，胡、許被逐，香港的第一著政策失敗。第二著便是香港資助陳炯明、鄧本殷兩路進攻廣州。陳炯明當時在香港設立機關，招兵買馬，在香港市上得以自由逮捕過往汕頭的罷工工人、海陸豐的農民以及革命的學生達二百人。香港政府又復勾引北洋四艦南來，幫助陳、鄧反攻。再則又嗾使土匪袁帶、林警魂陷落²⁶中山縣。此時罷工委員會本已準備解決罷工，9月28日香港中等華商代表來省，罷工委員會將香港沙面工人及學生要求之三十餘條件交其帶回香港。香港總督扳起面孔對華商代表說：「誰叫你帶回條件來！」很明顯的，香港帝國主義此時在指揮如意的搗亂廣東，此種計劃還未實驗，如何肯解決罷工！但因為當時罷工工人幫助國民黨左派堅決進攻陳、鄧，東江南路都次第收復，而香港第二著政策又失敗。

第二期，軟化時期。原來陳炯明佔領汕頭時，汕頭罷工立被解散，港汕交通恢復，但革命軍攻入汕頭時，本地罷工工人又捲土重來，封鎖香港。鄧本殷受香港八十萬元，專僱輪船八艘，載運糧食赴港，但革命軍攻入瓊崖時，此項接濟又被本地工人截斷

了。勾引南來之北洋艦隊，見陳、鄧已敗，不敢進窺虎門，只好悄悄率隊北返。香港亦無可奈何。同時又因香港中等華商見罷工已久，憤恨香港政府不予解決，使他們受「城門失火殃及池魚」之慘痛；又見國民政府著著勝利，同情廣東，於是而有「懇親團」之組織，12月26日來廣州，共代表三百餘人。繼而又有「華僑參觀團」之組織，不久亦來廣州，其人數亦相若。香港中等華商這些舉動，無疑的直接對廣東政府同情，間接即對香港政府示威。香港帝國主義知大勢已去，外既軍事失利，內又居民叛離，於是戲法為之一變，宣布派遣四個全權代表，赴廣州解決罷工，以安香港方面的人心。同時派華商代表八人先行來廣州，以探廣東方面的意旨。八個華商代表抵省以後，與罷工委員會商量經濟條件，罷工委員會答覆：「我們固然要經濟條件，同時也要政治條件；只談經濟條件，何能稱為根本解決？」並囑其轉告香港政府，所派定的四個全權代表，放膽來省，可以商量解決罷工。無論如何香港帝國主義此時確有軟化的表示。

第三期，猶豫時期。1926年1月，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以後，廣東政局內即發生新的醞釀，原因是共產黨在國民黨大會時採取了對於新右派的退讓政策，以致新右派得以紛紛回粵活動，於是左派的政權隱隱發生動搖。蔣介石以左派的資格一變為新右派的領袖，暗中準備反革命的政變。這種內容，香港帝國主義豈有不知之理，認為廣東既要發生政變，左派倒塌，右派登台，那麼又何必急急於解決罷工！所以香港政府派定的四個全權代表，始終遲遲不來。不僅如此，香港政府還在1月15日，率性宣布停止解決罷工，以示決絕。

香港帝國主義此時一方面靜候廣東的政變，一方面則用盡一切方法以加速這一政變。比方那時他們加緊「英國決用十萬大兵進攻中國」的宣傳。上海英國帝國主義的機關報，登載這樣一個消息：說「倫敦方面決將用武力干涉中國，預定十萬大兵，北攻天津，中攻滬漢，南攻廣州」。同時，英國公使向北京政府提出

質問：「究竟能否制止廣東排英運動？否則，英國當代為重大教訓。英國國會業已同意，預算將來對粵每日軍費一百五十萬。」很顯然的，這種恫嚇的作用，只是給右派一種藉口，好來提議解散罷工。再則就是勾結廣東右派加緊對於罷工工人的攻擊。伍朝樞等此時與香港政府已發生密切關係。在此時期，伍朝樞萬事不管，專門在國民政府委員會上，替外國商人告發罷工糾察隊的「不法」。又如公安局長吳鐵城向市民宣傳，「罷工工人比劉楊兵士還兇」，簡直有如開槍射擊罷工工人。很顯然的，這種造謠中傷的作用，一面是離間左派對於罷工的信任，一面也是給右派將來藉口強迫解散罷工打下基礎。香港帝國主義此時還有一個得意之作，就是促使粵海關停關。中國海關稅務司，依照不平等條約都須盡用英人，粵海關稅務司不用說亦是英人。2月22日粵海關突然宣告停關，藉口是「罷工糾察隊扣留八艇貨物，未經稅關查驗，糾察隊如此行動，彼實不能執行職務」。並對廣東政府說：「罷工委員會不聽政府命令，我來替你教訓。」又對廣東商人說：「我之停關，是為減少你們受糾察隊之壓迫。」又很明顯的，這種挑撥離間的作用，都只為了一個目的，就是催促廣東政變加速的到來。但一切陰謀，當時是被我們一一加以打擊，故一時未能生效。

直到3月，香港帝國主義見廣東政變竟未發生，不覺猶豫起來了，於19日派人到廣州面見汪精衛說：「香港政府有誠意解決罷工，已內定輔政司、律政司、華民政務司為代表，只須汪主席親筆寫一函去，三代表就可來省。」可見香港帝國主義此時還有意解決罷工。恰恰第二天廣東發生蔣介石的政變，罷工委員會亦被兵包圍，即所謂3月20日中山艦事件，於是香港帝國主義的態度又為之一變。

第四期，重新強硬時期。3月20日蔣介石的政變，使香港帝國主義從此根本取消解決罷工的意思。3月20日政變消息傳到香港以後，香港總督召集西商大會，興高采烈的說：「恭賀諸位！報告

你們一個好消息，就是20日廣東政府已上軌道了。」聽眾報以歡笑，高呼萬歲！所以香港政府內定的三個代表，遂不出發。4月9日，再派人到廣州與伍朝樞談說之後，香港政府率性宣布：「香港政府對於罷工期內工金及不能復業損失賠償，均不給予，亦不容許此項辦法。」以前香港帝國主義雖因面子關係，不願出錢，然而並未正式宣布決絕；香港商人出錢，香港政府至少已經默許，如1925年年底派八個華商代表到廣州談經濟條件可以證明。今則露骨的不承認出錢原則，而且佈露天下，咸使聞知，態度何等鮮明，何等堅決！無疑的這是3月20日政變的影響。香港帝國主義從此重行抱持強硬的態度，以至於後來的「中英談判」，仍堅決的把罷工問題撇開，我們在後面再說。這次省港罷工，本有極大的直接勝利的可能性，然而有了3月20日的政變，這種可能性完全取消了。

罷工與北伐

北伐是中國革命過程的大事，因為有了北伐，使中國革命發展到最高度，革命領土擴張到長江流域，中國工人運動、農民運動很迅速的得到長足的進步。北伐自然是當時中國全國革命高漲的需求，然而直接促進北伐則省港罷工實為很大的動力。廣東統一後，開始北伐的準備，雖然經過3月20日蔣介石的政變，但北伐終是革命的要求，終不能因任何障礙而阻止它的進行。6月，北伐出師了。在這次北伐中，省港罷工工人不用說是積極的參與。他們照東征南征一樣，組織運輸隊、宣傳隊、衛生隊，隨師北伐。特別是運輸隊三千餘人，給予北伐軍巨大的幫助。湘粵之交，為五嶺山脈，崇山峻嶺，道路異常險阻，又兼濕暑炎蒸，罷工工人重擔渡嶺，其困苦可知。也就因此，罷工工人病者好幾百人。北伐軍因得罷工工人這種幫助，出師異常迅速，8月便收復全湘，9月便直抵武漢，中國革命得到空前的發展。

中英談判

因為北伐的原故，因為「得以進行本國統一革新之工作」的原故，罷工委員會同意國民政府致函香港政府提議商量解決罷工。6月5日，國民政府去函，香港帝國主義答覆謂：「罷工已成過去事件，願派代表商量排英貨問題之解決。」國民政府回函聲明罷工仍為政治上經濟上一件要事，但亦可磋商，廣東人民業已維持一年以上之排英貨運動的方法與手段。9月15日，中英談判終於在廣州外交部實現了。第一次會議（15日）只國民政府致了一篇歡迎詞。第二次會議（16日）國民政府代表提出一意見書，大意是說廣東人民發生排英貨之直接原因，由於沙基慘案；沙基慘案之重要背景，由於上海「五卅」慘案。廣東為何有省港罷工與經濟絕交之排英運動？因為「廣州為中國民族主義最大中心點，無怪其於此案堅持民族主義以相對峙，而視為中國民族主義與外國帝國主義間鬥爭之顯著表示也」。中國以民族主義辦外交，並坦直指斥帝國主義，這算是中國外交史上的第一次。另外並質問為何香港對廣東實行經濟財政封鎖？為什麼拒絕國民政府在沙基慘案發生後所提議的解決條件？第三次會議（19日）英國代表提出答覆書，謂「五卅」屠殺是自衛行動；沙基慘案是中國先開槍；省港罷工是少數人強迫；香港並未封鎖廣東。第四次會議（21日）國民政府代表提出反駁書，引證據理，指斥其推諉圖賴。談判到此，國民政府提出解決辦法，組織一公正的第三者考察法庭，惟此事須延宕時日，如為早日恢復兩國關係計，主張兩方協力分任擔負：

- （1）第一，應保障不再有類似沙基慘案發生，此種保障，在於整頓沙面海陸駐兵，並限制英國砲艦停泊國民政府領土河面；
- （2）第二，根據極公平原則，撫卹沙基慘案死傷者家屬；

(3) 第三，解決因香港廣東正常關係破裂所發生的大失業問題，應籌備大宗款項。

英國代表對組織第三者考察法庭表示須請示本國政府；對早日恢復關係之三條件，表示反對，並聲言解決問題不能包含賠償在內。國民政府代表表示讓步，提議在第三者法庭未成立以前，應行借款，此項借債，雙方分別擔任，如將來英國在第三者法庭得到勝利，香港擔負之借款，由國民政府償還。英國代表表示反對，提議實業借款貸予中國，以為黃埔開埠之用，而以建築粵漢、廣九兩鐵路接軌為條件，其監督借款則依照廣九鐵路協約，僱用英國總工程師總管帳各一人。此日，罷工委員會偕與廣東工農商學各界召集十萬餘人之示威大會，發佈力爭沙基慘案與省港罷工條件的宣言。第五次會議（23日）雙方以其提議寫成條文，繼續討論，雙方皆表示須請示本國政府，而中英談判就此告一段落。其名延期，實則破裂。總而言之，中英談判雖為廣東自有獨立政府以來第一次與外國開的對等會議，為國民政府的新紀錄，但對於罷工解決是毫無結果。

取消對香港的封鎖

中英談判延期以後，罷工委員會發出致全國同胞書、致海外華僑書、致全國工會書、致世界工會書、致國民黨與國民政府書，除敘述中英談判經過外，請教三事：

- (1) 其將不念先烈沉冤，無條件屈服乎？
- (2) 抑將不但屈服，且進而接受英國所提出的實業借款條件乎？
- (3) 或不願屈服，須再接再厲，繼續奮鬥，以求最後之勝利乎？

對於三條道路，罷工委員會說：「因我等罷工，事關民族問題，並非純屬我等一己問題，何去何從，毫釐千里，故不能不求海內外同胞立予決定者也。」罷工委員會又申明：「我等奮鬥，

犧牲一切，本身利害，久非所計，如荷同胞指示，我們惟敬謹遵循，雖赴湯蹈火，決不瞻顧。」罷工委員會發出這信之後，各方面紛紛回答，都說「應當繼續奮鬥，誓為罷工後盾，以求得最後之勝利」。

本來罷工委員會有好幾次準備收束罷工。當1925年8月廖仲愷被刺的前後，曾有一度準備，因那時「五卅」運動，在北方各地已依次低落，廣東孤軍奮鬥，如何做得？於是而有「北上外交代表團」之發起，由各界各出代表二人及罷工代表八人共同組織之，將省港罷工所提的政治條件交付此代表團聯合全國去爭，而罷工委員會只與香港解決經濟條件便可復工。但此種準備，一方面固然因香港帝國主義一時還不願意解決，一方面確因當時東征南征，須要罷工封鎖香港，將帝國主義對於反革命派之援助策應斬斷，好讓我們關起門來在家裡捉賊，所以第一次準備收束罷工的計劃就作罷。1926年1月國民黨大會的前後，我們又有一次準備收束罷工，因東江南路均已收復，我們須準備北伐工作，如果香港帝國主義接受相當條件，亦可復工，故當時廣東方面派一重要官員到香港，作非正式之探詢；香港亦曾派一重要官員到廣州，非正式的表示要將罷工條件分為政治經濟二部，廣東方面答應如經濟方面原則上能承認，分開亦無不可；後來香港方面對於恢復工作一層，因謂商店倒閉，無業可復，完全復工，有些困難，廣東方面表示可以相當讓步。但因國民黨大會後廣東政局有新的醞釀，右派紛紛回粵，香港帝國主義因為有新的希望遷延解決，我們亦擬維持罷工，以預防右派的叛逆行動的發生，因為罷工工人經常聚集廣州者近五、六萬人之多，所以一種革命的濃厚空氣，實在是鎮壓右派的一種力量，所以第二次準備收束罷工的計劃又作罷。3月20日政變發生了，民族資產階級乘機進攻，此時當然我們不願收束罷工，自己解除武裝。到5月第三次全國勞動大會的前後，我們因急於需要出師北伐，又有一次準備收束罷工。勞動大會提出由國民政府、香港政府、廣州商人、香港商人和罷工委員會五方面舉出代表組織委員會，商量解決罷工。這個五方面共同

組織的委員會，亦含有打破香港方面謠言的作用，因為當時香港有一種謠言說：「香港出錢未為不可，不過恐其落在罷工領袖及過激派手中，仍用為繼續反對香港之用。」罷工委員會曾以此辦法，慫恿廣州商人派兩代表到香港，徵求香港商人同意，並託其轉徵香港政府同意，結果是香港政府置之不理，所以第三次準備收束罷工又作罷。陳獨秀、魏琴當時大罵廣東的黨部「太左，自始至終就無半點意思收束罷工，簡直是胡鬧」！據他們的意思，應該無條件解散罷工。自然他這種意見，我們無論如何不能贊同。但當時譚平山在上海的共產黨中央機關報宣布：「省港罷工終止了！」省港罷工在廣州分明沒有終止，而他們卻在上海宣布已經終止，這簡直是工賊的作用。²⁷

7月北伐出師了，而且所向克捷，收復全湘，直趨武漢，我們此時以為時機已至，決定自動的收束罷工，首先是取消對香港的封鎖。取消對香港封鎖的原因還有一個，就是廣州沿海農民的讓步。自罷工以來，封鎖香港，所以沿海一帶農產品一律禁止出口。當罷工初起時，罷工糾察隊封鎖海口，的確得農民的幫助不少，當時愛國熱潮甚高漲，農民也捲入這個熱潮之中。但封鎖實在太長久了，農產品停滯不能出口，農民當然大感不安，到1926年5月以後，農民與糾察隊在海口常常發生衝突，因為農民偷運農產物出口，糾察隊當然截留。此時正是新農產物上市時期，農民非得出口不行。罷工糾察隊封鎖以來，在各海口常發生戰爭，如沙魚涌之戰，糾察隊與鐵甲隊死者數十，是香港以兵艦飛機巨砲協助土匪幹的。太平之戰，糾察隊死者八人，是香港指使當地奸商土匪幹的。中山之戰，糾察隊全隊覆滅，是香港以機械資助土匪幹的。其他還有白鵝潭之戰，淡水之戰，前山之戰，大概都是奸商土匪協同幹的。在這些戰爭中，農民還有幫助糾察隊的，至少是守中立。但到此時便不然了，農民反對糾察隊，如寶安，好幾個鄰近英界的村莊農民，簡直與糾察隊取了武裝對抗的形勢，雖被糾察隊征服了，但農民不平之氣確是與日俱增。這一點也是逼得我們不得不取消封鎖的。

關於取消封鎖自然需要收束罷工²⁸、有一根本解決才行，罷工工人代表大會對此問題經過鄭重的討論。罷工委員會提出辦法，在關稅上附加二五稅，以此稅作為收束罷工。每一罷工工人先領一百元，到各處找工作，最好到香港找工作，六個月後，如不能找工作，可以回廣州，罷工委員會依然供其宿食。二五附加稅當然不是一次便夠發給所有罷工工人，可分五批發給：每批二萬人，以五個月發齊。此問題決定後，以二五附加稅由政府通知各國領事，期在必行，各帝國主義無法，只得在罷工工人這種偉大權威之下承認了。

於是1926年10月10日，罷工委員會召集廣州各界群眾大會，宣佈取消對香港封鎖，並宣言「我們對香港封鎖的取消，是為了將來根本收回香港的準備」。

10月11日，便於海關附近另建二五附加稅徵收機關，由政府與罷工委員會共同組織，開始徵收。

於是對於省港封鎖，便這樣的告一結束。

二五附加稅是由省港罷工開始的，這又是中國革命史中的新紀錄。此例一開，不僅國民政府領土內一切海關照例舉行，就是當時北方軍閥亦向帝國主義要求援例開辦，罷工工人所爭得的果實，不期軍閥也能得受實惠，真是出人意料之外。

此後省港罷工便辦理結束，實際上罷工並沒有完結，罷工委員會一切機關依然存在，罷工食堂與宿舍亦一律存在，一直到1927年整個國民黨叛變以後，汪精衛回粵，知省港罷工工人為一不可侮的勢力，於10月方用武力強迫解散罷工工人，罷工才算完結。所以正確計算，省港罷工從1925年6月起，應算至1927年10月為止，共兩年零四個月。

這次罷工的意義與教訓

這是一個為世界職工運動有史以來所未聞見的長期罷工，它的意義的確超過「罷工」以上。很明顯的，這個罷工在中國大革命的廣東時代，無疑的扮演了無產階級的領導角色。省港罷工委員會本身的確有獨立的政權性質（香港帝國主義所罵的「第二政府」），它當時在南中國的確成了各社會民眾團體的總領袖，它在廣東的地位的確有舉足輕重之勢，它的影響的確是巨大無比。也因此使廣東方面全省工人組織起來，全省農民（九十四縣之中有八十五縣）也組織起來。共產黨由四百餘人的小團體一變而為上萬數的真正群眾的政黨，以致無產階級和共產黨在政治上得到巨大的威信。幼弱的國民黨、國民政府、國民革命軍，更是得到省港罷工的幫助，鞏固了革命根據地，統一了廣東，實行了北伐，使革命高潮推向前進。所以省港罷工的意義，的確是不能以「罷工」的意義來解釋的，因為它超過了「罷工」的意義以上了。

省港罷工的策略是不是有錯誤？如就罷工範圍內所有主要的策略來說，我們直到現在始終還未發現錯誤，認為是正確的。關於個別的局部錯誤，當然是不免的，但與根本策略無關。的確省港罷工所採用的策略達到了最高的形式，不是工廠範圍的形式，也不只是國內範圍形式，而是國際範圍的形式，這在中國，這種罷工策略之最高形式，應該說是自省港罷工才開始的。我們要說這些策略就是我們的教訓，讀者可自去領會，這裡不重說了。

省港罷工遺傳下來的種子，直接影響到1927年12月的廣州公社的誕生。



圖片說明：1925年11月4日，鄧中夏（左4）與省港罷工委員會糾察隊合影。（《廣州工人百年圖錄》，廣州工人運動學會編，中國工人出版社，2009，北京。）

備註

[←1]

作者按：此文有一小部分來自較早的一篇文章《被黨國遺忘的三罷——省港大罷工100周年》，發表於2026年8月21日的追光者，
<https://pulsehknews.com/20260821comment/>

[←2]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後，6月3-4日北洋政府在北京街頭逮捕一千多學生，全國嘩然，上海舉行罷工、罷市、罷課，一百多城市響應。謂之三罷。日後的省港大罷工也模仿這種抗爭方式。一百年後它也成為香港2019抗爭運動的主要口號。

[←3]

香港工人發動罷工後，容易斷糧，且殖民政府也四處抓捕罷工領袖，所以十幾萬工人索性回廣州。此時國共合作已經開始，國民黨廣州政府表示願意提供食宿。英國在港政府立即戒嚴和命令火車停駛。工人唯有「行路上廣州」。

[←4]

习近平：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https://www.gwytb.gov.cn/m/headline/202504/t20250429_12698156.htm

[←5]

《周日話題：不再說的省港大罷工》，余衡方，2025年6月22日，
<https://ol.mingpao.com/ldy/cultureleisure/culture/20250622/1750527035771/%E5%91%A8%E6%97%A5%E8%A9%B1%E9%A1%8C-%E4%B8%8D%E5%86%8D%E8%AA%AA%E7%9A%84%E7%9C%81%E6%B8%AF%E5%A4%A7%E7%BD%B7%E5%B7%A5>

[←6]

《工聯會舉辦「省港大罷工100周年」紀念大會 弘揚愛國主義精神》，
[https://www.ftu.org.hk/zh-HK/counselingDetail?
id=1974593840224538624&type=2](https://www.ftu.org.hk/zh-HK/counselingDetail?id=1974593840224538624&type=2)

[←7]

《省港大罷工對工會組織的影響》，載《粵港工人大融合—省港大罷工九十周年回顧論文集》，周奕、伍錫康、梁寶霖、梁寶龍編輯，香港社會保障學會、香港工運史研究小組出版，2017年5月。

[←8]

同上，85頁。

[←9]

按《中國工人運動史》第三卷，這項要求是“減租二成五。另外，其所列要求，也比余文多了一個總項、「廢除不平等條約」共17條。《中國工人運動史》，主編劉明達、唐玉良，第三卷，1998，廣東人民出版社，220頁。

[←10]

《「省港大罷工百周年」座談會圓滿舉行》，

<https://www.hkchronicles.org.hk/%E6%96%B0%E8%81%9E%E4%B8%AD%E5%BF%83/%E3%80%8C%E7%9C%81%E6%B8%AF%E5%A4%A7%E7%BD%B7%E5%B7%A5%E7%99%BE%E5%91%A8%E5%B9%B4%E3%80%8D%E5%BA%A7%E8%AB%87%E6%9C%83%E5%9C%93%E6%BB%BF%E8%88%89%E8%A1%8C>

[←11]

《香港举办座谈会回顾省港大罢工 以史为镜弘扬爱国精神》，
https://www.sohu.com/a/906538460_121443915

[←12]

鄧中夏，《中國職工運動簡史》，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1979年第六次印刷，227-8頁。參看當時罷工委員會出版的《工人之路》（第廿二期第一版，1925年7月16日）：「罷工委員會要時常向我們代表大會，報告會務情形。使我們實際上真能監督我們的首領忠心替我們做事。」來源：馬克思主義文庫/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19250530/grzl-022-19250716-1.htm>

[←13]

此處之國民黨，意指孫中山在1919年改組的那個國民黨，不是1912年成立的國民黨。

[←14]

此文所指的第二次革命，不是孫中山討伐袁世凱的「二次革命」，而是指1925-27年的工農革命，是相對於辛亥革命而言。孫之「二次革命」不是以工農群眾為革命主體，嚴格來說不算是革命，而是軍事冒險。

[←15]

鄧中夏，《著者申明》，《中國職工運動簡史》，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
1979年第六次印刷。

[←16]

《他是中共最早的58名党员之一，用39年人生诠释了伟大建党精神》，
<https://www.ccphistory.org.cn/shds/shhm/content/897c9c1f-ddc3-4c89-9aab-2e8b2d31d8fe.html>

[←17]

《邓中夏：中国工人运动的著名领导人》，

http://www.81.cn/yl_208589/16225791.html

《中國工人運動的奠基者——鄧中夏》，中華全國歸國華僑聯合會，

<https://www.chinaql.org/BIG5/n1/2021/0914/c420278-32226775.html>

[←18]

關於這段歷史，參考王觀泉《被綁的普羅米修斯—陳獨秀傳》。比較新的是唐寶林《陳獨秀全傳》，作者在前言中說，「人們可以...看到，陳獨秀在共產國際代表的指導下...被迫接受國際命令加入國民黨...；被迫放棄獨立發展中共...接受史太林...的訓令向國民黨讓步屈服，...史太林又是怎樣把失敗的罪責推到陳獨秀身上。」《陳獨秀全傳》，中文大學出版社，香港，2011，xii-xiii。

[←19]

編按：此為音譯，意謂保險公司。

[←20]

1925年5月滇軍將領楊希閔、桂軍將領劉震寰，針對國民黨左派與共產黨，在廣州發動兵變。廣州革命政府下令討伐，蔣介石回師廣州，擊潰楊、劉軍隊。

[←21]

「海關兩」只是當時中國海關使用的計算重量和價值的標準單位，用於記帳。這是因為當時中國各地使用的貨幣和重量標準非常混亂。

[←22]

編按：「大有造於」是古文，意謂「大有助於」。

[←23]

原注：鐵路工人和海員工人的罷工對平定劉楊戰爭的巨大支援，按著者原來的編寫計劃是要寫在「廣東時代極盛期」一章（見「著者申明」）中，後來因著者忙於革命的實際工作，原來的編寫計劃未能實現。

[←24]

編按：即所謂中山艦事件。蔣介石懷疑有人陰謀綁架他，在廣州緊急戒嚴，逮捕海軍局代局長、共產黨員李之龍，監視和軟禁大批共產黨人，解除省港罷工委員會的工人糾察隊武裝，包圍蘇聯領事館，監視蘇聯顧問。事後查明並無此事，蔣介石被迫放人。當時國民黨分裂為左右兩派，右派堅持清共。蔣介石本稱左派，但不滿意左派領袖汪精衛。經此一役，蔣介石開始獨攬大權，汪精衛下野。蔣一年後清共，屠殺共產黨人和工農運動份子，大革命失敗。

[←25]

編按：此節所謂香港，皆指香港的英國殖民地政府。

[←26]

編按：指兩人1925年10月率部攻擊中山，其後被廣東革命政府平定。

[←27]

請參閱再版序言。

[←28]

省港大罷工後期，罷工委員會與廣州國民政府共同徵收2.5%附加稅以補償工人損失。